

第二群青铜(铁)鍍研究

郭 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目 次

- 一 序言
- 二 青铜(铁)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三 青铜(铁)鍍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 四 第二群青铜(铁)鍍在欧亚大陆的传播
- 五 结语

一 序 言

1869年,欧洲第一个匈人铜鍍被发现。尔后,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和森林山地交界地带,尤其是离草原不远的森林山地中,不断有这一类独具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容器被零星采集或为考古所发现。此种容器有青铜、铁和陶质,绝大多数为青铜质。主要形制为双立耳,有的耳部有装饰,腹体呈筒形或球形,腹下部有一足,足分圈足和三足,也有少量无圈足铜鍍。这种北方民族使用的特殊器物源远流长,圈底或平底的鍍形器起源于中国商末中原文化与北方方国文化的交错地带。这是在商代晚期以来北方民族学习商朝青铜容器铸造及礼制的文化背景中完成的,西周中期北方民族开始大量使用青铜鍍,带圈足的铜鍍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出现。尔后各民族相互学习铜鍍制造技术,并相互区别,直到公元8世纪在北方草原渐渐消失^[1]。由于其发展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型式多样,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北方草原民族迁徙的物证,因而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随着材料的日益丰富,人们从确定这类鍍的年代、族属和用途到反映的民族迁徙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研究的结果看,铜鍍总的可分为早晚两大群。第一群为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4世纪。这一时期的铜鍍主要为猗狁、戎狄、大月氏、丁零人、斯基泰人、萨夫罗马泰人、塞人和萨尔马泰人等古代游牧民族所使用。第二群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这一时期的铜鍍主要为匈奴(匈人)和鲜卑等所使用。这两群铜鍍在时代上有重合,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但在地域上基本没有重叠。本人在《青铜鍍在欧亚大陆的初传》一文里

集中讨论了第一群铜镏^[2]。本文仅对第二群青铜(铁)镏做一些研究。通过考古类型学等方法,力图建立晚期青铜(铁)镏的年代和时代分布体系,并对其所反映的民族迁徙问题做初步的探讨,希望能推动青铜(铁)镏问题研究的深入。

二 青铜(铁)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学界对青铜镏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研究的进步总是和新的发现相伴随。在欧美,其研究可划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1869 年,匈牙利派斯特县的托尔泰尔发现了第一个青铜镏。匈牙利学者弗洛雷斯·罗默撰文认为它应当属于迁徙时代^[3]。尔后,在伏尔加—卡马河地区,阿尔泰山泰利特斯科伊湖以及叶尼塞河河谷又发现了铜镏,学者们都认为它们属于迁徙时期。德国学者瑞吉奈克第一个指出,这些圆筒形腹体的铜镏和斯基泰铜镏属于两个系统,并用霍克吕契特发现铜镏的共存物给“匈人式”铜镏断代^[4]。尔后,学者们开始探讨“匈人式”铜镏的渊源、特点、装饰的功能等问题。匈牙利学者哈穆派认为匈人式铜镏和西伯利亚游牧人有关系,并指出这种器物是祭祀时盛祭品的礼器^[5]。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了匈人青铜镏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上半叶。以四位学者的工作为代表。其一是匈牙利学者白拉·珀思塔,他穿越了俄罗斯的西部地区、丰提克(Pontic)地区、高加索、乌拉尔山,并到达了西西伯利亚的托姆斯克(Tomsk)。他第一个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地方博物馆的藏品,把这些铜镏归为匈人—日耳曼时期^[6]。另一位匈牙利学者佐尔坦因·费尔维兹·塔卡斯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认为铜镏是由匈人带入欧洲的,东欧发现的铜镏形制吸收了中国祭祀容器的特点,并强调了其作为祭器的功能^[7]。还有匈牙利学者阿霍尔迪分析了匈人文化后,也认为铜镏来源于亚洲^[8]。再就是马克斯·艾伯特根据在因特西萨罗马建筑中发现与铜镏共存的罗马头盔,从而断定类似遗物的时代大约为公元 4 世纪。这一阶段确定了匈人青铜镏的年代,并看出它们同中国文化的关系。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德国学者约艾契姆·沃尔勒认为霍克吕契特式铜镏属于阿提拉时期,同时指出了匈人铜镏同萨尔马提亚铜镏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如匈人式铜镏口沿和萨尔马泰铜镏腹部绳形装饰的联系,认为匈人式铜镏蘑菇形耳是萨尔马泰铜镏耳部突起的发展形式,指出铜镏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在俄罗斯比较分散而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却很集中,铜镏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最有意义的是他研究了库托出土的匈人王冠的细节后提出,蘑菇状耳是生命树的象征^[9]。提契推测蘑菇状把手模仿了南俄罗斯圆头王冠形别针,小格子装饰是匈人时期流行的珉琅技法。匈牙利学者鸠拉·拉斯兹罗认为器耳上的蘑菇状突起可看作葬仪容器上装饰的冠,因为蘑菇状的造型及上腹部圈形垂饰和匈人皇冠上的造型相似^[10]。匈牙利学者伊诺娜·考夫雷格指出匈人式铜镏大多数是不同的作坊铸造的,而有些非常相似的可能来自同一个作坊,她认为铜镏在东欧的出现同阿提拉公元 445 年征服庞若里亚有关系,铜镏

主要在礼仪活动中使用,并赞成蘑菇形把手装饰是生命树的象征^[11]。美籍奥地利学者玛恩辰—海洛芬在其名著《匈人世界》中讨论了匈人式镞的发展、成分、形式和用途等问题,推论匈人式镞不是起源于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而是起源于中国北部和西北边境^[12]。这一时期是匈人青铜镞研究的深化阶段,学者们注意了很多以前没有考虑的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认识。

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者扎塞特斯科亚、哈霍因和戴柯奈斯库研究了乌拉尔山南端奥伦堡和罗马尼亚埃奥莱斯提的新发现后指出,第一个匈人式铜镞公元5世纪初出现于多瑙河地区,可能和匈人首领乌尔狄斯在公元404年和408年领导的扩张运动有关,在征服庞若里亚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学者们强调铜镞的分布的确反映了匈人从乌拉尔扩张至法国的过程,东欧发现的铜镞应当是在多瑙河地区制造的,并且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1993年,俄罗斯学者博柯维科和扎塞特斯科亚结合他们自己收集的56个容器材料,探讨了匈奴西迁的史实^[13]。1994年,这两位学者在一篇大致和前述文章相同的英文文章中,总结了匈人式铜镞研究的历史。通过细致的类型学分析,把他们收集的铜镞分为两群。第一群铜镞最大的特点是腹体外表被垂拱形、方形和复杂的纹饰分为四个部分。第二群铜镞为筒形腹、圜底、腹体上部呈漏斗形,无镞孔圈足,方形大把手,口沿上为蘑菇状突起。根据有无蘑菇状突起又可把第二群铜镞分为两组。两群铜镞的共同特点是腹体表面都被突棱分为四个部分,这和斯基泰和萨尔马泰铜镞截然不同,从铸造方法上也可看出其间的区别。两位学者引述美籍匈牙利学者米克罗斯·鄂第的观点,认为乌鲁木齐发现的铜镞反映了游牧人向东的迁徙运动,指出阿尔泰山和奥伦堡发现的两件铜镞对证明匈奴西迁问题的重要性,而卡马河发现的铜镞显示了匈人同乌戈尔人(Ugrian)部落的联系,锡尔河发现的陶镞可能是匈奴在这一地区居留过的证明^[14]。这些细致的类型学分析的确是切中问题的要害,使该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米克罗斯·鄂第对青铜镞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他在1990年^[15]、1992年^[16]、1994年^[17]和1995年发表文章讨论青铜镞的问题。特别是在1995年的文章中补充了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的新材料,从而使他的研究基于180个镞的基础之上。鄂第按铜镞的分布由西向东分为六个大区,依次进行论述。对于中国学者,除了鄂第的结论外,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鄂第有关镞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史的回顾,其细致的图表囊括了他尽力收集的180个镞的材料,再加上岩画的讨论,从而使本文今天的研究有一个广泛而坚实的基础^[18]。美国学者埃玛·邦克、卡娃密、林嘉琳和中国学者乌恩共同合作在1997年出版的《赛克勒藏品中的东欧亚草原古代青铜器》一书中研究了四件晚期青铜镞,对其进行了断代和相关讨论^[19]。在另一本书中,埃玛·邦克研究了两件国外收藏的匈奴—鲜卑时期的青铜镞^[20]。这是全面研究第二群青铜镞的时期,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

铜镞也颇为日本学者所重视,最早是1931年梅原末治的《中国北部发现的一种铜容器及其性质》一文^[21]。1935年出版的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所著《内蒙古·长城地带》专辟一章论述铜镞,文章结合了中国以外的材料,参考了中原式铜器,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22]。最近比较显著的工作是草原考古研究会的成员高浜秀。在《中国的镞》一文中,作者按考

古学方法把铜钺分成了八型,逐一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而这八型也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其中汉代以降的铜钺基本属于匈奴—鲜卑时期^[23]。199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了《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一书。书中刊录了日本收藏的一些铜钺,其综述文章和文字解说均为高浜秀所撰,他对铜钺作了断代和对比研究^[24]。可以说日本研究中国铜钺的最新成果都集中体现在高浜秀的这些文章中。最近出版的由藤川繁彦主编的《中央欧亚大陆考古学》也引用了学界对铜钺的研究成果^[25]。

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料介绍,或零星,或成批,并加以简单的族属推断。另一类是系统的研究。这里主要评述系统研究文章。

中国最早涉及第二群铜钺研究的是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李逸友。他在《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一文中介绍了一座被破坏的墓中出土的铜钺^[26]。田广金、郭素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介绍了他们收集的铜钺,指出铜钺环耳上的突与殷代铜刀环首上突的联系^[27]。顾志界在《鄂尔多斯式铜(铁)釜的形态分析》中讨论了中国发现的钺,作者注意到南方出土的一些罐形铜钺^[28]。1991年,新疆的张玉忠、赵德荣发表了《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大型铜器及有关问题》,此文介绍了新疆发现的青铜钺材料,特别是对乌鲁木齐南山发现的蘑菇突状耳青铜钺进行了研究^[29]。1992年,李肖、党彤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一文中讨论了新疆发现的铜钺^[30]。吉林大学冯恩学在《中国境内的北方系东区青铜釜研究》一文中,以型式分析为起点,对铜钺的断代、分期和演化趋势进行了探讨,通过与国外铜钺详细比较研究,阐明了中国铜钺特点和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该文根据扶风出土师同鼎的铭文,把铜钺存在的上限提早到西周中期。并且根据外贝加尔的恰克图市沙拉郭勒镇发现的一件钺耳,揭示了山字形耳与蘑菇突方耳之间的嬗变关系^[31]。1995年,内蒙古的卜扬武、程玺发表了《内蒙古地区铜(铁)钺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一文,他们研究了内蒙古地区历年来发现的铜(铁)钺及其相关材料,对它们的形制与演变、族属、源流和用途作了讨论^[32]。1996年,新疆的王博、祁小山在《新疆出土青铜钺及其族属分析——兼谈亚欧草原青铜钺》一文中认为草原青铜钺主要是用于祭祀,并讨论了鄂尔多斯式、南西伯利亚式、斯基泰式和萨尔马特铜钺的型式与年代。他们认为南西伯利亚式青铜钺属于北迁狄人的遗物,可称为丁零人铜钺,并且推断新疆发现的单乳突铜钺可能属于先月支人和月支人文化^[33]。1996年,辽宁的尚晓波在《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空足釜及相关问题考》一文中,从双耳镂空足钺的分布与形态演变区分了属于鲜卑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具体的族群归属^[34]。

以上基本勾勒了第二群青铜(铁)钺研究的历史,本文的研究即以这些不懈研究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外学者往往就一个历史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对钺本身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关于铜钺的分区分期,还没有一个整体把握之上的研究,而且有些铜钺的时代还未能确定。所以对各时代各地区铜钺的形态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认识仍然模糊。关于铜钺的族属问题,大多是简单的推测,国外的学者甚至把大多数的铜(铁)钺都认为是匈奴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需要扎实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和文献爬梳工作。本文希望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第二群青铜(铁)钺本身类型学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三 青铜(铁)钺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青铜(铁)钺流行时间长,按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收集的青铜(铁)钺进行谱系分析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方法是根据一些能考知确切年代的标型钺,找出演变规律,建立以型式分析为基础的青铜(铁)钺时代框架,把未知年代的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对铜(铁)钺进行分期研究,最后再对各期铜(铁)钺的分布与类型做出总结。根据历史背景和青铜(铁)钺本身的演变特点,在作类型学分析的时候,把它们分为两大群。第一群变化主要表现在耳部,因此把耳部作为划分类型的根据,这一群已经有专文论述。第二群变化主要是底部,所以以钺的底部作为划分类型的根据。为了保持青铜(铁)钺研究的完整性,型式编号仍延续第一群钺,从G型开始。

(一)G型镂空圈足铜钺

这一型铜钺的圈足都有三角形或梯形镂空,按耳部变化区分亚型。Ga型为直立环耳;Gb型为桥形方耳;Gc型为“山”字形耳,两耳根带阶形装饰;Gd型为“山”字形耳;Ge型为斜肩耳;Gf型为小肩环耳;Gg型为三乳突耳;Gh型为环状鋸耳。

Ga型:分五式。

I式:卵形腹,口内敛,尖圜底;有三角形镂空。

1. 俄罗斯色楞格河左支流伊沃尔加河(Ivolga)乌兰乌德西的伊沃尔金斯克(Ivolginsk)发现一件。出自匈奴墓葬,时代为公元前2—前1世纪(图一,1)^[35]。

2. 1989年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沙尔布拉克发现一件。现藏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通高37.2、口径27—28、底径13.5厘米,颈部有附耳,圈足低矮(图一,2)^[36]。

II式:深筒腹,高圈足,大镂空。

1. 内蒙古土默特旗砖室墓出土一件。通高19.7厘米,时代为北魏早期(图一,3)^[37]。

2. 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砖室墓出土一件。耳为绳索状,时代为北魏早期^[38]。

3. 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一件。共存的鞍桥、马蹬与北票房身村晋墓和安阳孝民屯M154出土器比较,特征相同,因而可推定此式铜钺年代为前燕时期(公元337—370年)(图一,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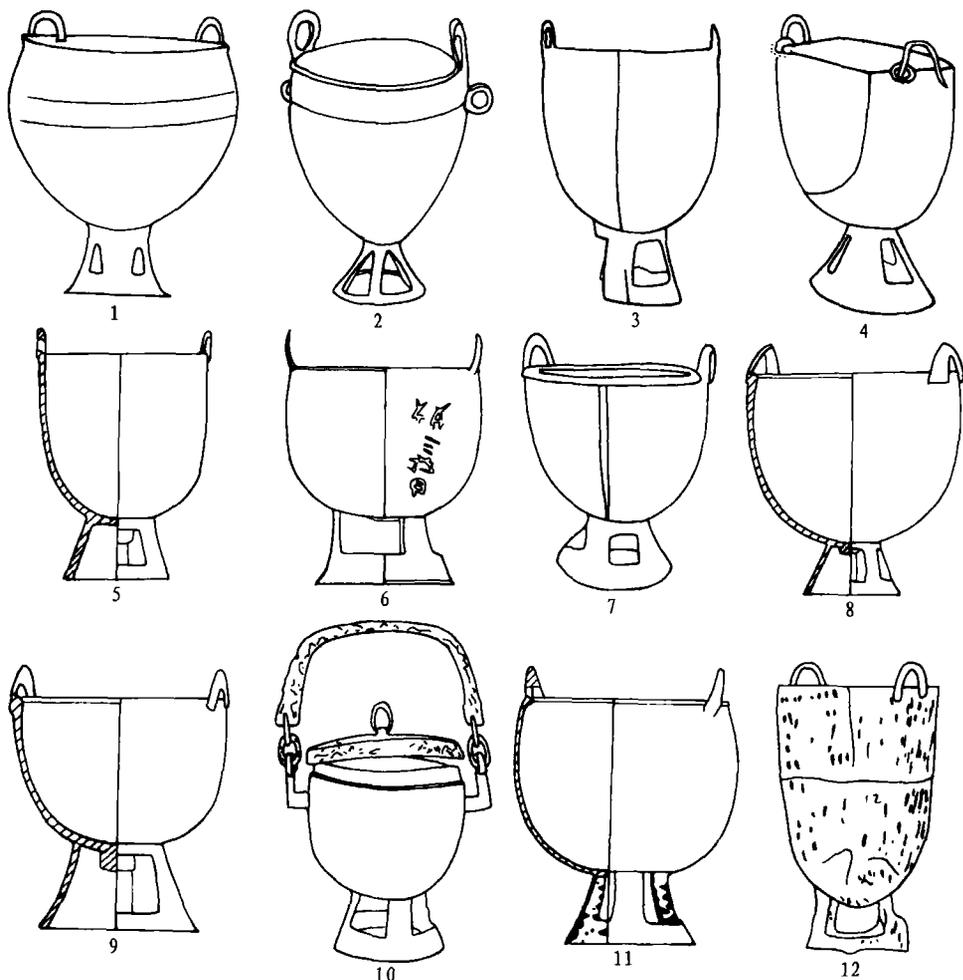
4.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一件^[40]。

5. 陕西西安文管会藏一件。通高22.3厘米^[41]。

6. 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藏一件。

7. 吉林发现一件^[42]。

8. 甘肃秦安五营邵店出土一件。足有三个镂空,足中心有一圆柱,通高18厘米(图一,



图一 Ga 型铜甗

1. Ga I-1(伊沃尔金斯克) 2. Ga I-2(沙尔布拉克) 3. Ga II-1(土默特旗) 4. Ga II-3(辽宁袁台子)
 5. Ga II-8(甘肃邵店) 6. Ga III-10(山西智家堡) 7. Ga III-1(陕西芹河乡) 8. Ga III-4(辽宁于杖子)
 9. Ga III-5(辽宁下河首果园) 10. Ga III-6(辽宁西官营子乡) 11. Ga IV-2(山西大同) 12. Ga V-1(图瓦艾梅尔雷格)

5)^[43]。

9.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藏一件。高 22.7 厘米^[44]。

10.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其中一件铁质的,耳残,可能为环耳,时代为三燕^[45]。

11.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葬 M217 出土一件。铁质,口径 10.4、足径 8、高 16 厘米。足上镂孔不规则,时代约为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中叶^[16]。

12.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葬 M266 出土一件。青铜质,口径 10.8—12.3、足径 8.5、高 18.7 厘米。圈足上的镂孔不大。腹的一面扁平,可能是为了靠在墙上。时代约为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中叶^[47]。

Ⅲ 式：腹稍浅。

1. 陕西榆林县芹河乡出土一件。足有三个镂孔，足中心有一圆柱(图一,7)^[48]。
2. 绥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购买一件^[49]。
3. 美国芝加哥费尔德(Field)博物馆藏一件。1909年购于西安^[50]。
4. 辽宁喀左县草场乡于杖子遗址出土一件。铁制，耳为宽板状半圆形，腹稍浅，足有三镂孔，腹底有柱状突起，年代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早期阶段(图一,8)^[51]。
5. 辽宁朝阳七道泉子乡河首果园北魏墓出土一件。铁制，耳为宽板状半圆形，腹浅，腹底有圆柱，圈足宽高，时代为北魏中期(图一,9)^[52]。
- 6-8. 辽宁北票西官营子乡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三件。有铁提梁和铁盖。此墓为北燕中期埋葬，公元415年左右(图一,10)^[53]。
9.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一件。形制与冯素弗墓出土器同^[54]。
10. 山西省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墓中出土一件。口径11.3、通高13.3厘米，腹部有阳文铸字“白兵三奴”，隶书竖排，其中前三字皆为反字。时代为孝文帝初期(图一,6)^[55]。
11.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葬M202出土一件。青铜质。口径14.6、足径8.5、高18.7厘米。时代约为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56]。

Ⅳ 式：球腹；大镂孔圈足。Ⅳ 式的年代下限可能为北魏。

1. 北京购买一件。耳残^[57]。
2. 山西大同出土一件(图一,11)^[58]。
3. 北京购买一件^[59]。
4. 美国纽约塞克勒收藏一件^[60]。
5. 美国纽约塞克勒收藏一件^[61]。

Ⅴ 式：深筒腹；大镂孔圈足。

1. 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图瓦的艾梅尔雷格3号古墓群5号墓组1号墓发现了一件。铁质，与唐代铜镜和开元通宝共出，时代为公元8世纪(图一,1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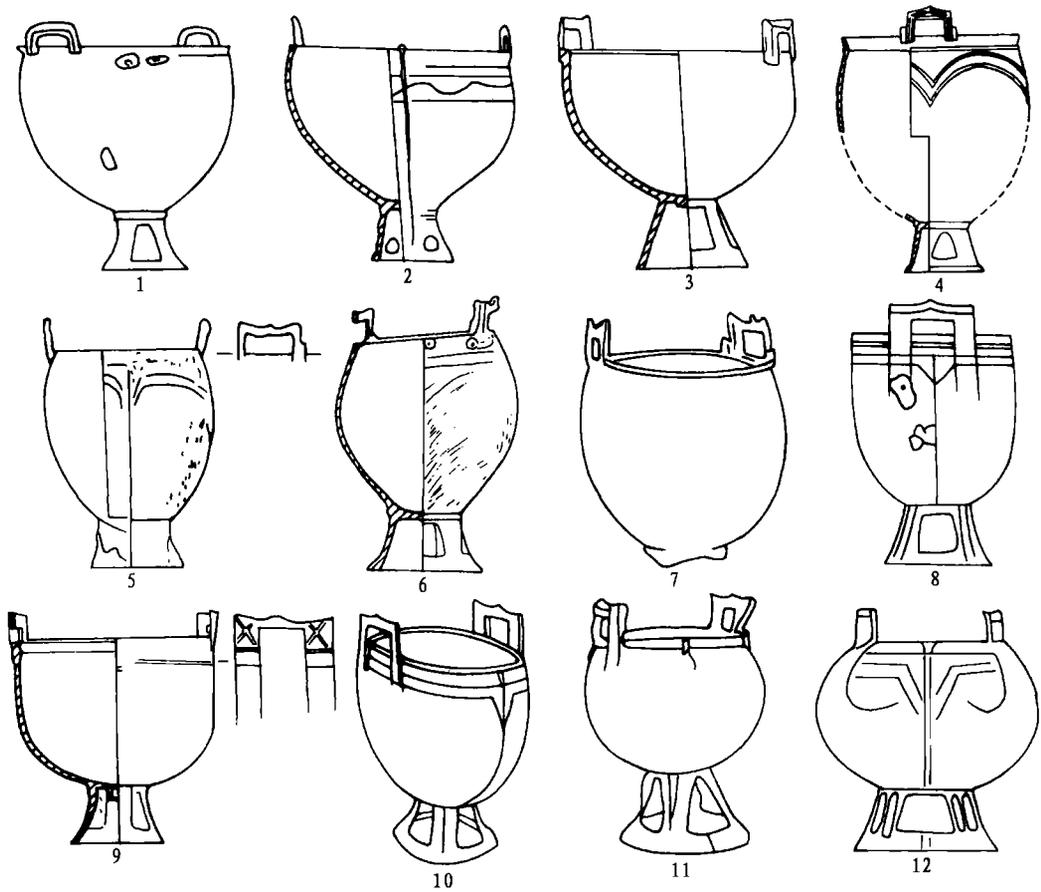
Gb 型：分三式。

I 式：圈足有小梯形镂孔。

1. 俄罗斯色楞格河地区萨瓦(Sava)发现一件(图二,1)^[63]。
2. 俄罗斯吉达河(Dzhida)西岸迪莱斯图伊(Direstuy)匈奴墓发现一件。时代为公元前1世纪^[64]。

Ⅱ 式：高圈足，镂孔稍大。

1. 内蒙古扎赉诺尔1986年M14出土一件。鼓腹，口微敞，口沿下有两道弦纹，弦纹之间绘有波浪纹，圈足有四个镂孔，年代为西汉中期(图二,2)^[65]。
2. 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古墓1959年出土一件。耳、口残，圈足可能损失。时代可能为



图二 Gb、Gc、Gd 型铜馕

1. Gb I -1(萨瓦) 2. Gb II -1(内蒙古扎赉诺尔) 3. Gb III -1(辽宁于杖子) 4. Gc I -3(诺颜乌拉) 5. Gc I -8(呼和浩特钢铁厂) 6. Gc I -9(吉林老河深) 7. Gc II -2(陕西菠萝滩村) 8. Gd I -2(甘肃秦安) 9. Gd I -1(内蒙古乌审旗) 10. Gd I -4(内蒙古) 11. Gd I -1(蒙古) 12. Gd II -3(内蒙古)

两汉之际(图三,7)^[66]。

3. 河北张家口购买一件。颈部有两道弦纹^[67]。

4. 绥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购买一件。桥形方耳贴附于口,素面,圈足残^[68]。

5. 内蒙古东胜县博物馆藏一件。颈部有两道弦纹,圈足镂空很大^[69]。

Ⅲ 式:尖圜底;腹底圆柱衰退;圈足高大,四镂空。

1. 辽宁喀左县草场乡于杖子出土一件。铁制,时代为北魏中期(图二,3)^[70]。

2. 1994 年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墓葬发现一件。铁制,通高 20.4 厘米,时代为北魏^[71]。

Gc 型:分二式。

I 式:腹饰四分大波状装饰纹;圈足或有梯形镂空。

1. 贝加尔湖鄂尔浑河地区发现一件。圈足无镂空^[72]。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发现一件。耳残^[73]。

3. 蒙古诺颜乌拉(Noin Ula)6号墓出土一件。残,此墓所出耳杯有“建平五年”的文字,是西汉哀帝年号,为公元前2年(图二,4)^[74]。

4. 内蒙古林西县大营子乡征集一件。耳部特征与诺颜乌拉(Noin Ula)6号墓出土器同,颈部起大波纹,圈足矮,有梯形镂空^[75]。

5. 内蒙古呼和浩特博物馆藏一件。特征与诺颜乌拉(Noin Ula)6号墓出土器同,残^[76]。

6. 内蒙古赤峰县巴林左旗征集一件。耳残,腹部特征与诺颜乌拉(Noin Ula)6号墓出土器同,圈足特征与林西县大营子乡征集器相同^[77]。

7. 内蒙古托克托县黑水泉发现一件。耳残,圈足残,特征与诺颜乌拉(Noin Ula)6号墓出土器同^[78]。

8.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钢铁厂工地发现一件。通高31厘米,内有牛骨残片(图二,5)^[79]。

9. 吉林省榆树老河深M56出土一件。通高25厘米,时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图二,6)^[80]。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一件。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一件。

12. 蒙古胡尼伊河谷(Huniy)纳马托郭(Naymatolgoy)墓3出土一件镡耳。山字形^[81]。

13.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件。高35.5厘米^[82]。

14. 日本艺术大学艺术资料馆藏一件。高26.5厘米^[83]。

Ⅱ式:“山”字形耳的中脊发展为一突。

1. 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恰克图市沙拉郭勒镇发现一件。仅发现一耳^[84]。

2. 陕西榆林县小纪汗乡菠萝滩村1982年征集一件。口沿下有两道凸起弦纹,腹部亦有四道突起的弦纹,每条两端下垂而互不相连,足残(图二,7)^[85]。

Gd型:分二式。

I式:筒腹。

1. 内蒙古伊盟乌审旗1986年北魏窖藏出土一件。铁质,口沿有两对称鞍桥形直立方耳,耳部有交叉凸棱纹,颈部有一圈凸弦纹,未重合(图二,9)^[86]。

2. 甘肃秦安出土一件(图二,8)^[87]。

3. 美国纽约私人收藏。素面。M. Erdy认为出自甘肃^[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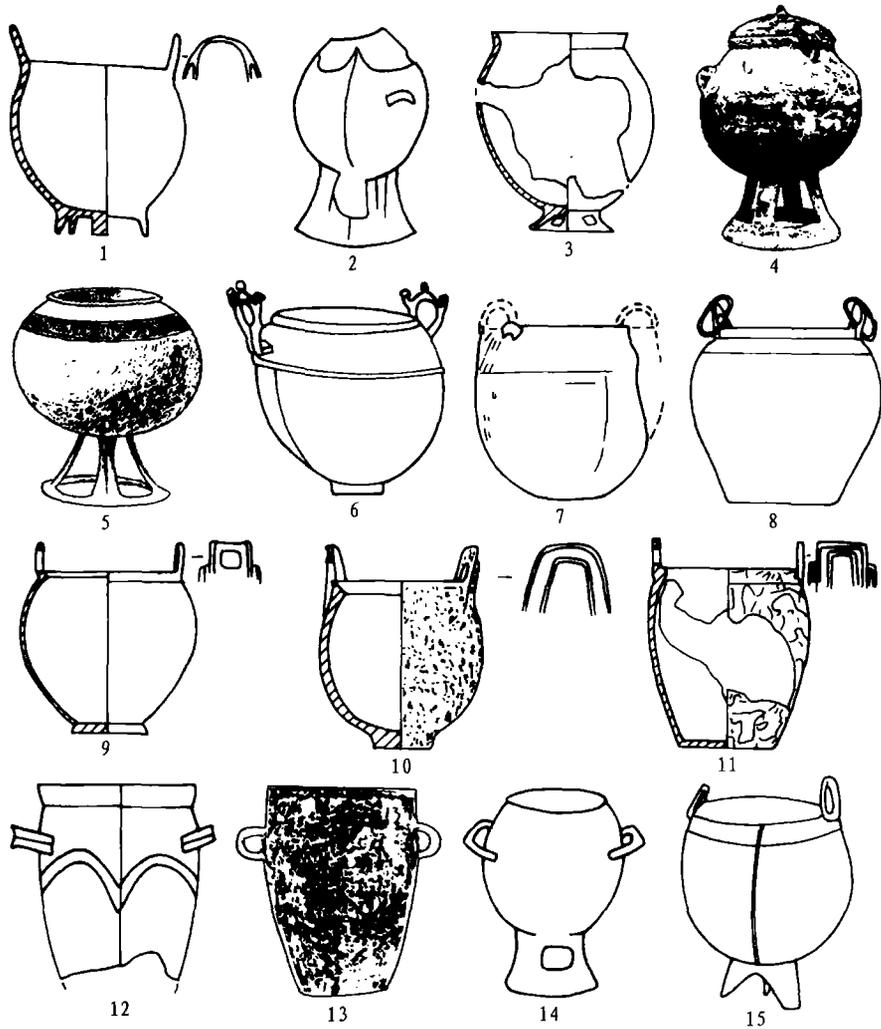
4. 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一件。颈部饰弦纹一圈,腹部被框形纹饰分隔为两部分,腹体变浅,圈足镂空显著,藏布达佩斯拉斯·乔济(Rath Gyorgy)博物馆(图二,10)^[89]。

Ⅱ式:球腹;圈足镂空非常大。Ⅱ式的年代在公元494年左右。

1. 蒙古征集一件(图二,11)^[90]。

2. 北京购买一件^[91]。

3. 内蒙古征集一件(图二,12)^[92]。



图三 Gb、Ge、Gf、Gg、Ia、Ib、J 型铜甗

1. J-1(内蒙古苏泗汰) 2. Ge-2(赛克勒藏品) 3. Gf-1(内蒙补洞沟) 4. Gf-2(齐藤悦藏氏藏)
 5. Gf-3(新疆库鲁克山) 6. Gg-1(内蒙和林格尔) 7. Gb II-2(内蒙古扎赉诺尔) 8. Ia I-10(湖北鄂城)
 9. Ia I-2(内蒙古二兰虎沟) 10. Ia II-1(山西善家堡) 11. Ib I-1(内蒙补洞沟)
 12. Ib IV-1(日本藏) 13. Ib V-1(日本藏) 14. Ge-1(青海民和) 15. J-4(河南杨晋庄村)

Ge 型:斜肩耳,球腹。

1. 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一件。圈足镂孔为圆形(图三,14)。
2. 美国赛克勒先生(Arthur M. Sackler)收藏一件。高 15.5 厘米(图三,2)^[93]。

Gf 型:无耳或小环耳,球腹;大圈足,镂孔十分大。

1. 内蒙古东胜县补洞沟墓葬出土一件。无耳,小圈足,有镂孔(图三,3)^[94]。
2. 日本大阪故齐藤悦藏氏藏一件。有盖,肩部有一耳(图三,4)^[95]。
3. 1901 年 2 月 10 日斯文·赫定的探险队在罗布泊北部的库鲁克山地区发现一件。铁质,

肩部有小环耳(图三,5)^[96]。

4. 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一件^[97]。

5. 日本藏一件。腹部一侧有耳型突起^[98]。

6. 太原出土一件(T84QS14)。高 23.7、腹径 19.1 厘米。直口鼓腹,镂空圈足,圈足有焊接修补痕迹。口部有扣,在与肩部结合处有一小铰链以连釜盖(未发现釜盖),肩部对称一系^[99]。

Gg 型:球腹。

1. 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墓出土一件。高 51.7 厘米,环形附耳,圈足残(图三,6)^[100]。

2. 美国纽约私人收藏一件。高 37.5 厘米^[101]。

Gh 型:筒腹。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葬 M49 出土一件。口径 19.2、足径 10.5、高 26.6 厘米。口外侧有两对称的环状釜耳。时代约为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中叶^[102]。

(二)H 型无镂空圈足铜镞

H 型铜镞圈足无镂空。可分二亚型。Ha 型耳部有蘑菇状突起;Hb 型为方形耳。区分式的标准是耳部的变化。

Ha 型:分五式。

I 式:山字形耳发展为三个蘑菇状小突起,两耳根处的附加装饰上部变尖。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乔尔纳亚库吕亚(Chernaia kuria)发现一件。圈足残(图四,1)^[103]。

II 式:山字形耳为三个突起,两耳根的附加装饰上部发展为两个突起。俄罗斯南乌拉尔奥伦堡(Orenburg)克兹尔-阿德(Kizil-Adir)发现一件(图四,2)^[104]。

III 式:山字形耳上三个突起以及两耳根装饰上的两个突起发展为五个蘑菇状突起,耳根附加装饰离开主耳;深筒腹,腹部有复杂装饰。

1. 俄罗斯北高加索卡巴尔德波卡尔(Kabardbaikar)哈巴兹(Habaz)马尔卡(Malka)河源头附近出土一件。腹部主体纹饰同 II 式,外加穗形装饰(图四,3)^[105]。

2.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Rostov)伊万诺夫卡村(Ivanovskoe)发现一件(图四,4)^[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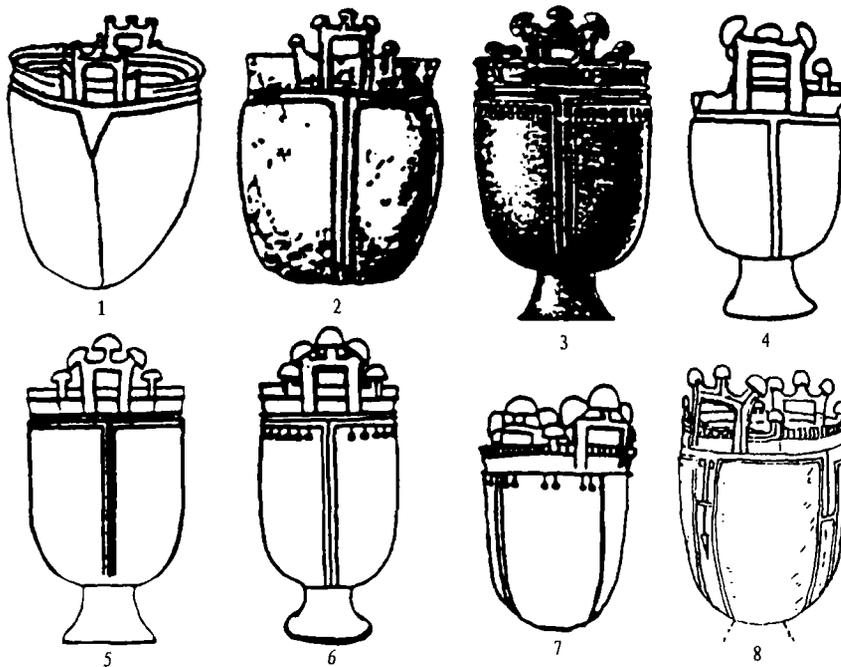
3. 捷克奥帕瓦(Opava)贝内绍夫(Benesov)发现一件铜镞耳。突起不发达(图五,13)^[107]。

4. 罗马尼亚西奥尔泰尼亚地区(Oltenia)克拉约瓦区(Craiova)霍塔拉尼(Hotarani)发现一件。仅存一耳(图五,10)^[108]。

5. 罗马尼亚蒙泰尼亚(Muntenia)区莫斯蒂什泰湖(Mostistei)附近的博什尼亚古(Bosneagu)发现一镞耳(图五,12)^[109]。

6.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西北 70 公里的约内什蒂(Ionesti)发现一件。器完整(图四,5)^[110]。

7. 罗马尼亚西奥尔泰尼亚地区(Oltenia)克拉约瓦区(Craiova)代萨(Desa)发现一件。完整器,腹部纹饰同本式第一件(图四,6)^[111]。



图四 Ha 型铜馘

1. Ha I-1(乔尔纳亚库吕亚) 2. Ha II-1(奥伦堡) 3. Ha III-1(北高加索哈巴兹) 4. Ha III-2(伊万诺夫卡村) 5. Ha III-6(约内什蒂) 6. Ha III-7(代萨) 7. Ha III-8(卡帕斯河谷) 8. Ha III-13(新疆南山沟)

8. 匈牙利托尔纳(Tolna)县霍杰斯(Hogyesz)北的卡帕斯(Kapos)河谷出土一件。蘑菇形装饰发达,口沿外有小方格装饰一周(图四,7)^[112]。

9. 匈牙利费耶尔(Fejer)多瑙济瓦罗斯(Dunaujvaros)出土一件。仅存腹部一小块,有三道弦纹(图五,14)^[113]。

10. 斯洛伐克科马尔诺(Komarno)伊扎-莱尼瓦尔(Iza-Leanyvar)出土三残片。和公元 4 世纪的钱币共存^[114]。

11. 罗马尼亚蒙泰尼亚(Muntenia)切利伊苏西达瓦(Celeisucidava)发现四块残片。为口沿部分,一块带蘑菇状装饰,出于罗马堡垒的灰烬中(图五,9)^[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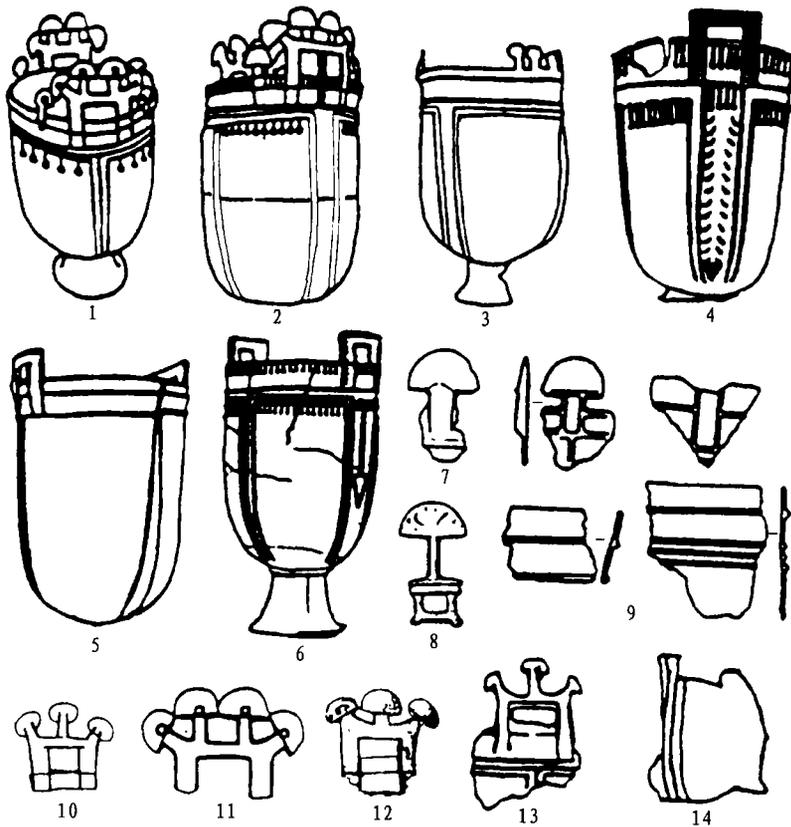
12. 罗马尼亚西欧泰尼亚(Oltenia)发现一馘耳。现藏布加勒斯特博物馆(图五,7)^[116]。

13. 新疆乌鲁木齐南山沟发现一件。通高 72 厘米,蘑菇形装饰发达,口沿外有小方格装饰一周,腹部框形纹饰之间有箭形纹饰,同 Hb-1(图四,8)^[117]。

14. 乌兹别克斯坦纳林赞巴巴(Narinzhan-Baba)发现一馘耳^[118]。鄂第认为此件铜馘耳可能是嚧哒的遗物(图五,8)^[119]。

IV 式:大方耳上又多出一个蘑菇状装饰。

1. 乌克兰摩尔达维亚(Moldavia)列济纳区(Rezina)舍斯塔契(Shestachi)发现一件(图



图五 Ha、Hb 型铜钺

1. Ha IV-1(舍斯塔契) 2. Ha IV-3(特尔泰尔) 3. Ha V-1(皇宫堡) 4. Hb-2(上科奈特斯)
 5. Hb-3(霍克吕契特) 6. Hb-1(奥索卡) 7. Ha III-12(欧泰尼亚) 8. Ha III-4(乌兹别克斯坦纳林赞巴巴)
 9. Ha III-11(切利伊苏四达瓦) 10. Ha III-4(霍塔拉尼) 11. Ha IV-2(维也纳购买)
 12. Ha III-5(博什尼亚古) 13. Ha III-3(贝内绍夫) 14. Ha III-9(多瑙济瓦罗斯)

五,1)^[120]。

2. 奥地利维也纳购买到一钺耳。这件耳的细部特征和上述一件完全相同,即蘑菇状装饰的柄和帽相结处有一小圆圈(图五,11)^[121]。

3. 匈牙利佩斯县(Pest)特尔泰尔(Tortel)墓内出土一件。口沿外有小方格装饰一圈,腹体被方框形纹饰分隔为四块,每块上部有穗状装饰(图五,2)^[122]。

V式:大耳两边的小耳每边发展为两个。匈牙利维斯普雷姆县(Veszprem)皇宫堡(Varpalota)出土一件(图五,3)^[123]。

Hb型:方形大耳。

1. 俄罗斯西乌拉尔(Simbris)乌里扬诺斯克(Ulianovsk)区奥索卡(Osoka)发现一件。口沿外有穗状装饰,腹体有四个方框形装饰,方框上部有穗状装饰,大耳下的方框间隙有一箭形

装饰(图五,6)^[124]。

2. 俄罗斯沃洛格达(Vologda)瑟克提沃卡尔地区(Syktyvkar)上科奈特斯(VerkhniKonets)发现一件。装饰基本与奥索卡器同,但穗状装饰非常发达,大方耳下无箭形装饰(图五,4)^[125]。

3. 波兰西里西亚地区(Silesia)延杰恰维斯(Jedrzychowice),又名霍克吕契特(Hockricht)河滩发现一件。基本无装饰(图五,5)^[126]。

(三) I 型无圈足铜鍪

I 型铜鍪无圈足。可分二亚型。I a 型罐形腹体; I b 型为桶状腹。

I a 型:分二式。

I 式:方耳,耳根有阶梯形装饰。

1. 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县补洞沟墓中发现一件^[127]。

2. 内蒙古乌盟二兰虎沟出土一件。高 16 厘米(图三,9)^[128]。

II 式:直立环耳。

1. 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出土一件。铁质,高 14 厘米,时代为东汉桓灵至魏晋时期(图三,10)^[129]。

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赛科乡 1987 年出土一件。藏固原博物馆。

3—5.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三件。

6. 甘肃平凉市博物馆藏一件。

7. 甘肃平凉地区博物馆藏一件。平凉灵台县出土。

8. 河南巩县芝田公社出土一件。共存物有铜洗和塔形器,铜洗和传世东汉洗相似^[130]。

9. 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竖穴砖棺墓出土一件。时代为 3 世纪末 4 世纪初^[131]。

10. 湖北鄂城钢铁厂古井发现一件。通高 20 厘米,肩部刻有铭文:“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腹部刻有:“武昌”、“官”。腹下部满饰均匀的弦纹,靠近底部,有一破洞,附有一个用生铁铸补的补丁。“黄武元年”是三国吴主孙权的第一个纪年,为公元 222 年(图三,8)^[132]。

11. 四川双流黄水乡出土一件。高 20.5 厘米,时代为南北朝^[133]。

12—14.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六件鍪三件属此式。时代在公元 415 年左右^[134]。

15. 北京收购,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藏一件。腹部饰弦纹四周^[135]。

16.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公布的二件铁质鍪一件属此式。时代为三燕^[136]。

17.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葬 M209 出土一件。青铜质,口径 15.3—16.3、高 18.5 厘米。时代约为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中叶^[137]。

I b 型:分五式。

I 式:方耳,耳根有阶形装饰。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县补洞沟墓中发现一件。铁质,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图三,11)^[138]。

Ⅱ式：一耳为方，一耳为环。内蒙古乌盟二兰虎沟古墓出土一件。高 18 厘米，时代为东汉晚期^[139]。

Ⅲ式：直立环耳。

1. 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县补洞沟墓中发现一件。铁质，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140]。
2. 内蒙古发现一件。耳呈拱桥形贴附于口^[141]。
3. 内蒙古察右前旗下黑沟墓葬出土一件。通高 16 厘米，底部有一块修补疤。时代为东汉晚期^[142]。
4. 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购买一件。腹部有波状带纹^[143]。
5. 北京购买一件^[144]。
6. 吉林榆树老河深 M97 出土一件。通高 26 厘米。时代为东汉初期或稍晚^[145]。
7. 陕西神木县孙岔乡马家沟出土一件。高 21.8 厘米，一耳残^[146]。
8. 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出土一件。高 22.5 厘米，根据出土的夹砂大口平底罐、铜镜和五铢钱，时代为东汉桓灵之际至魏晋时期^[147]。
9. 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出土一件。高 21 厘米，腹上部有一圈凸棱装饰，时代为东汉桓灵之际至魏晋时期^[148]。
10. 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出土一件。颈部有凸弦纹一周，其下饰四组弧形纹，时代为东汉桓灵之际至魏晋时期^[149]。

11. 山西朔县东官井村 1984 年发现一件。通高 16 厘米，时代为东汉晚期^[150]。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一件。通高 22、口径 14、底径 10 厘米。

13. 甘肃省平凉白水出土一件。藏平凉地区博物馆，通高 22 厘米。

14. 蒙古(Dulga-Ul)M15 出土一件^[151]。

15. 吉林省集安太王乡下解放村出土一件。高 13 厘米^[152]。

16. 吉林省浑江市东甸子墓葬出土一件^[153]。

17. 河北省定县 43 号汉墓出土一件。有提梁^[154]。

18、19. 韩国金海大成洞 29、47 号墓出土二件^[155]。

20. 韩国伽耶文化墓葬出土一件^[156]。

Ⅳ式：斜肩耳。日本藏一件。腹饰大波带纹，其纹饰和诺颜乌拉 M6 所出铜镡相近，因此，此件铜镡年代为东汉早中期(图三，12)^[157]。

Ⅴ式：肩部小环耳。

1. 日本京都守屋孝藏氏收藏一件。双耳(图三，13)^[158]。

2. 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藏一件。单耳^[159]。

(四)J 型三板形足铜镡

1. 内蒙古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葬出土一件。通高 14 厘米，底部有烟熏痕迹，铜镡和拓跋

鲜卑陶罐和三鹿纹金牌饰共存,时代为东汉末年,可能是拓跋鲜卑西南迁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遗物(图三,1)^[160]。

2. 内蒙古林西县文管理所藏一件。底部有烟熏痕迹,通高 14 厘米^[161]。

3. 陕西淳化关庄出土一件。口径略呈半椭圆形,腹部三方鼓起,一方平直,两耳紧贴口沿外,三短足略向外撇,通高 20 厘米。素面,腹壁有铸造痕迹,腹外有烟灸^[162]。

4. 河南淇县杨晋庄村出土一件。通高 18 厘米(图三,15)^[163]。

5. 日本藏一件。一耳残^[164]。

6. 陕西绥德县城关镇 1979 年征集一件^[165]。

(五)青铜(铁)镞的分布与时代特点

第二群铜镞多为征集,而且型式多样,分布地域广(图六)。本文结合相关材料,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更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

这一群包括 G—J 四型铜镞,其中还有很多亚型,时代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8 世纪。根据铜镞的特征和分布,可把这一时期分为三大阶段。

1.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末

早段(公元前 2 世纪至前 1 世纪末)。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河地区,有 Ga I、Gb I 式铜镞。铜镞的最大特点是圈足上的镂孔较小,为三角形,耳有环耳和桥形方耳,腹体下部收得很急,呈尖圜底。这几件铜镞被认为出自匈奴墓葬。内蒙古东北的达莱湖地区,有 Gb II 式铜镞。特点是圈足上镂孔不大,桥形耳,尖圜底。扎赉诺尔墓地一般被认为是拓跋鲜卑的遗迹^[166]。这一地区的铜镞可能受色楞格河地区的影响。

晚段(前 1 世纪末至公元 1 世纪末)。有 Gc I、Gc II、Ia、Ib 型铜镞。Gc I 式铜镞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内蒙古东部和中南部、宁夏固原地区、吉林省。Gc II 式铜镞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和陕西北部。Ia、Ib 型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东胜县、吉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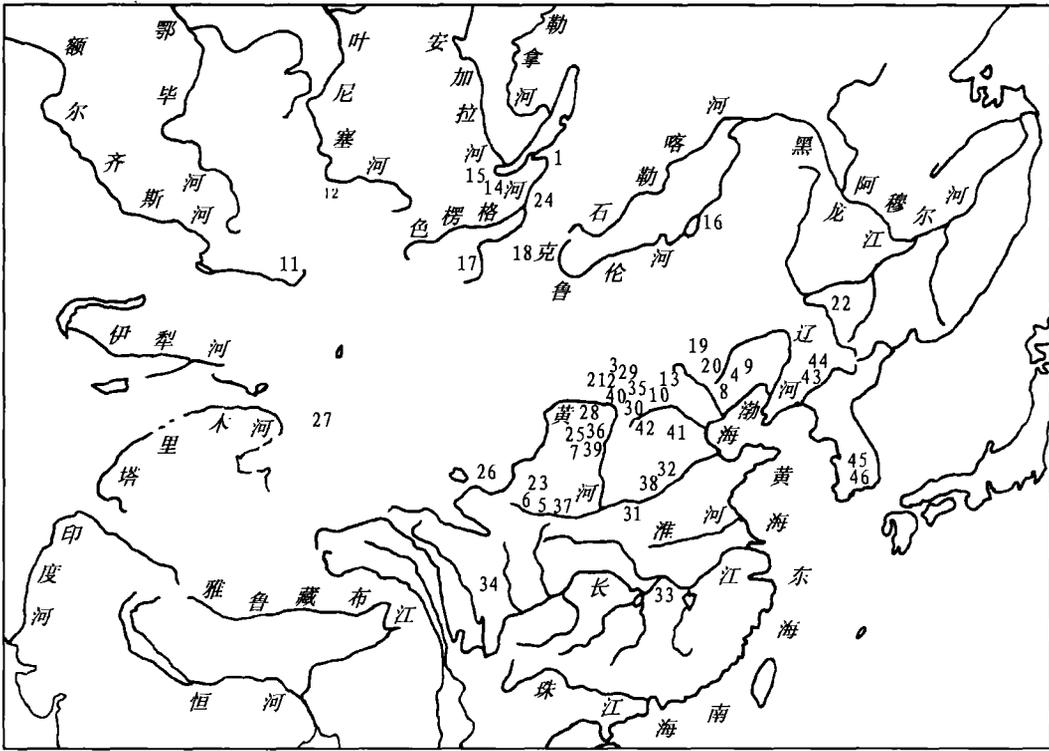
2. 公元 1 世纪末至 5 世纪末

这一时期的铜镞分两大组。一组是 H 型铜镞向欧洲的发展,反映了匈奴西迁的过程;另一组包括 G、I、J 型铜镞,在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发展,反映了鲜卑的活动以及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1)H 型铜镞的分布与时代

H 型铜镞分布于四个大区,也是 H 型铜镞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区为新疆北疆区,以 Ha I 式铜镞为代表,时代为公元 91—160 年;第二区包括从巴尔喀什湖至伏尔加河的广大地区,还包括乌拉尔山中段西侧的一些地区,有 Ha II、Hb 式铜镞,时代为公元 160—350 年;第三区包括北高加索、库班河、顿河下游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地区,以 Ha III 式铜镞为代表,时代从公元 350 年至 374 年;第四区包括顿河下游、第聂伯河、多瑙河地区,以 Ha III、Ha IV、Ha V、Hb 式铜镞为代表,时代从公元 374 年至 455 年。

(2)G、I、J 型铜镞的分布与时代



图六 第二群青铜(铁)镞在亚洲东部的分布示意图

1. 乌兰乌德(Ga I) 2. 土默特旗(Ga I) 3. 呼和浩特市(Ga II、Gc I、Ib III) 4. 朝阳(Ga I) 5. 平凉(Ga I、Ib I、Ib III) 6. 秦安(Ga I、Gd I) 7. 榆林(Ga III、Gc I) 8. 喀左(Ga III、Gb III) 9. 北票(Ga III、Gh、Ib I) 10. 大同(Ga IV) 11. 富蕴(Ga I) 12. 图瓦(Ga V) 13. 张家口(Gb II) 14. 萨瓦(Gb I) 15. 迪莱斯特伊(Gb I) 16. 扎赉诺尔(Gb II) 17. 鄂尔浑河(Gc I) 18. 诺颜乌拉(Gc I) 19. 林西(Gc I) 20. 赤峰(Gc I) 21. 托克托(Gc I) 22. 榆树(Gc I、Ib III) 23. 固原(Gc I、Ib I、Ib III) 24. 恰克图市(Gc I) 25. 乌审旗(Gd I、Ib III) 26. 民和县(Ge) 27. 库鲁克山(Gf) 28. 东胜县(Gf、Ia I、Ib I、Ib III) 29. 乌盟二兰虎沟(Ia I、Ib I) 30. 右玉(Ib II、Ib III) 31. 巩县(Ia I) 32. 安阳(Ia I) 33. 鄂城(Ia I) 34. 双流(Ia II) 35. 察右前旗(Ib III) 36. 神木(Ib III) 37. 淳化(J) 38. 淇县(J) 39. 绥德(J) 40. 和林格尔(Gg) 41. 定县(Ib III) 42. 代县(Ib III) 43. 集安(Ib III) 44. 浑江(Ib III) 45. 金海(Ib III) 46. 伽耶(Ib III) (注:H型未标)

这一组铜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汉晚期。有 Ia I 式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乌盟、伊克昭盟和山西北部;Ib 型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乌盟、伊克昭盟、察右前旗、山西和陕西北部、宁夏南部、甘肃平凉地区;J 型铜镞,分布于内蒙古林西县。

第二阶段为东汉晚期至北魏早期。有 Ga II 式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辽宁大凌河地区;Gd I 式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Ia II 式铜镞,分布于湖北、河南、四川地区;Ib 型铜镞仍然存在,并传播到朝鲜半岛;Gg 型铜镞,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

第三阶段为北魏中晚期(大致在孝文帝改革前后)。有 Ga III 式铜镞,分布于辽宁大凌河地区、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甘肃秦安;Ga IV 式铜镞,分布于山西北部;Gb III 式铜镞,分布于辽

宁大凌河地区;Gd II 式铜镞,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J 型铜镞,陕西淳化、河南淇县各出土一件。

3. 公元 5 世纪至 8 世纪

目前仅见一件(Ga 型 V 式-1),出于俄罗斯图瓦地区,时代为公元 8 世纪。

四 第二群青铜(铁)镞在欧亚大陆的传播

(一)从铜镞的发现看匈奴的西迁

公元 374 年左右,一支被西方史家称为“匈人”的东方民族,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又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区,降服了日尔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逐走了西哥特人,进而出现在西方文明的门前,最终冲击了西方文明世界。最初欧洲人不知道匈人来自何方,直到 18 世纪后期法国人冯秉正用了 45 年功夫,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称为《中国通史》(1777—1785),共 13 巨册,西文中才有了较详细的中国历史。法人德·揆尼又根据《通鉴纲目》等书,著成《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部鞑靼各族通史》(1770)。根据中国资料,详细叙述了匈奴人早期的历史,并且论证了欧洲的“匈人”即中国历史上的匈奴。18 世纪后期,英国历史学家吉朋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1),采用了德·揆尼关于“匈人”来源的说法。不过,法国人克拉普洛特著《亚洲史表》,对德·揆尼的说法提出异议。此外法国人拉米萨和德国人李特都反对匈人即匈奴之说。以后,英国人伯克著《鞑靼千年史》(1895),德国人夏德著《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和匈奴》(1900),都主张匈人即匈奴。英国拜占庭史家伯利著《后期罗马帝国史》(1923)和《蛮族侵入欧洲史》(1928)也认为匈人的祖先确是中国历史中的匈奴。但英国汤普生(1948)仍坚持匈人非匈奴,匈人的来源不可知。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贯穿于匈人和匈奴研究的整个历史。20 世纪中叶至末期,西方学界比较多的历史学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些著名的学者对匈奴—匈人同源问题或怀疑或持否定态度。比较新的研究认识到匈奴西迁过程中人种、文化等的复杂性。或认为匈奴和匈人存在着渊源关系,但是由于沿途其他人群的影响,匈奴在西迁的过程中,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67]。或认为西迁匈奴应是匈人先祖的一部分,但其中也包括其它民族,尤其是嚧哒人。二者在宗教礼仪、语言和血统上表现出的相似性似有利于支持上述推测^[168]。

很久以来,中国史学界不清楚匈奴西迁后的去向。直到 19 世纪末年,元史学家洪钧在他出使俄国时,参阅西方史籍,于 1897 年著成《元史译文证补》。他根据西方著作,记述了匈奴攻入欧洲的过程。尔后,王先谦著《后汉书集解》,将洪钧这段记载录入他的《后汉书·西域传》注解中。再后,章太炎^[169]、梁启超^[170]、金元宪^[171]和何震亚^[172]等学者都开始注意到匈奴西迁的历史,认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即是中国汉代西迁的匈奴。此后,齐思和^[173]、肖之兴^[174]、林幹^[175]、郭平梁^[176]和王彦辉^[177]以及港台的学者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及了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在林

幹另一专著中,又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178]。日本学者认为匈奴与匈人同族的学者不少,以内田吟风为集大成者^[179]。同西方一样,有学者质疑同族论者所持的文献记载及文物的合理性^[180]。认为匈人不可能是匈奴,4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有可能是一些史籍失载的西迁的鲜卑人。这些西迁的鲜卑人中包括若干原来隶属于匈奴的部落^[18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些学者^[182]。总之,关于匈人是否就是匈奴后裔的问题,中外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183]。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匈奴的人种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学界迄今对匈奴整体的文化并不是非常了解。匈奴在东方消失和匈人在西方出现之间隔了近200年,地域上相距也较远,其间肯定发生了很多人种、文化融合变化的事件,而这些历史没有记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学者存在异议非常正常。就现状而言,根据中外文献研究这个问题的空间可能已经不多,考古不断的发现与研究可能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

发掘现有的各种材料,利用考古材料以实证的方法来证实匈奴的西迁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有价值的。在这方面鄂第已做出有益尝试,但是他的论证稍显粗糙,而且把不是匈奴的铜镞也用作证据。因此,有必要再作一番论证。

从铜镞的发现来看,匈奴的活动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Ga I、Gb I、Gc I、Gc II、Ia I、Ib I、Ib II和Gf型铜镞为代表,时代约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1年。

用考古材料论证匈奴西迁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起点。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蒙古诺颜乌拉(Noin Ula)墓群属于匈奴。因此本文的讨论就从诺颜乌拉6号墓出土的铜镞开始。这件铜镞耳呈“山”字形,两耳根处各起阶形附件,腹饰大波状装饰纹,圈足有梯形镂孔。6号墓所出耳杯有“建平五年”的文字,是西汉哀帝年号,为公元前2年,所以6号墓的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因此,这件铜镞的年代也大致在西汉末年。此件铜镞属于本文分型的Gc I式,与此铜镞相同的标本还发现于贝加尔湖鄂尔浑河地区、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林西县、巴林左旗、托克托县、宁夏固原和吉林省榆树老河深。后几件铜镞除老河深铜镞出于鲜卑墓地外,余都为征集,没有明确的共存物,因此,其时代和族属都不好肯定,但可能和匈奴有关系,时代也应和诺颜乌拉6号墓铜镞相近。榆树老河深出的青铜镞,有可能来自匈奴,至少和匈奴有密切的关系。鲜卑很好地保持了这种形式铜镞的特点。

在论证匈人即匈奴西迁主体问题时,最需要证明的是蘑菇形耳的青铜镞到底从何而来。现在这一问题有了一些证据。陕西榆林县小纪汗乡菠萝滩村1982年征集一件铜镞。这件铜镞“山”字形耳的中脊发展为一突(Gc II-2)(图二,7)。另外,在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恰克图市沙拉郭勒镇发现一件铜镞耳朵,也是“山”字形耳的中脊发展成一突,显示了“山”字形耳向蘑菇形耳铜镞的嬗变关系^[184]。而这种形式的铜镞在明确的鲜卑墓中尚未发现。以上铜镞应当属于匈奴,这一阶段匈奴基本还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墓中,几乎不见铜镞^[185]。而匈奴比较早一些的铜镞发现于色楞格河地区。俄罗斯色楞格河左支流

伊沃尔加河(Ivolga)乌兰乌德西的伊沃尔金斯克(Ivolginsk)发现的一件。耳为直立环耳,圈足为小三角形,被认为出自匈奴墓葬,时代为公元前 2—1 世纪(Ga I-1)(图一,1)。俄罗斯吉达河(Dzhida)西岸迪莱斯图依(Direstuy)匈奴墓发现一件。耳为桥形方耳,圈足有小梯形镂空(Gb I-2)。从耳部特征和圈足镂空可以看出,小纪汗乡菠萝滩村、沙拉郭勒镇和诺颜乌拉 6 号墓发现的铜馐应当渊源于 Ga I-1 和 Gb I-2 这两件铜馐。

中国北方自战国中期开始,由于列国的强大,尤其是燕、赵、秦的强大和修长城拒胡,再加上戎狄融入华夏族,所以,不见铜馐的踪影。中国北方战国晚期结束的文化主要有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杨郎文化和北辛堡文化,其中只有北辛堡文化发现铜馐。所以匈奴使用铜馐可能是保持了北辛堡文化的传统。石板墓文化被认为和匈奴起源有关系,其中也有铜馐发现^[186]。因此匈奴使用铜馐也有可能和石板墓文化有关。一般认为匈奴的族源来自东方^[187]。这种认识都有助于上述两种推断。如果北辛堡文化是匈奴的源头之一,则匈奴使用铜馐当然在情理之中。而如果早期匈奴不使用铜馐,那么东部地区不是一个青铜馐的流行区恰恰也支持这种推断。

第二阶段以 Ha I 式铜馐为代表,年代在公元 91—160 年。

公元 48 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公元 87 年,鲜卑进击匈奴,斩北单于,引起北匈奴大乱。此后又经过几次战争,公元 91 年(和帝永元三年),北单于被汉将耿种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击破后“遁走乌孙”。这样,北匈奴就一直“辗转蒲类海、秦海之间”,也即新疆北疆一带。一直到公元 151 年,北匈奴呼衍王还在西域活动。公元 153 年北匈奴之名还出现于史书,此后便史书阙如了。这可能和鲜卑人檀石槐的西征有关,这次变故可能导致了匈奴的西迁^[188]。可以认为,匈奴退出蒙古高原应当是东汉对北匈奴的出征及东汉“以夷伐夷”政策的结果。东汉与北匈奴周边南匈奴、鲜卑、乌桓、丁零等诸部落联手打击、孤立北匈奴,是迫使北匈奴西迁的主要原因^[189]。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不可忽视,公元 2 至 3 世纪欧亚草原大旱灾也是促使匈奴最终离开中亚草原地区的原因之一^[190]。总之,匈奴西迁不是一次完成,应当是若干次向西迁徙的结果,每一次向西移动应当都有具体的原因。

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乔尔纳库吕亚发现一件铜馐。山字形耳发展为三个蘑菇状小突起,两耳根处的附加装饰上部变尖(Ha I)(图四,1)。此铜馐和 Gc I、Gc II 一脉相承,应当是匈奴于公元 91—160 年或稍早在此地区留下的。

第三阶段以 Ha II 和 Hb 为代表,时代约在公元 160—350 年。

从公元 160 年至公元 290 年期间,正是匈奴在中西史书阙如的部分。从公元 290 年前后开始,西方史书出现了匈奴人活动的记载。据美国学者麦高文(W. M. McGovern)介绍:“此后二百年间,即当公元 170—370 年之间,本文对于这些北匈奴人的情形,差不多全无所闻。此一期间,中国正忙于内争,一面又受鲜卑人入侵的威胁,故和远处西域的匈奴人失去一切接触,而这些匈奴人也不能再进犯中国。同时在西方则因有阿兰人(Alani,阿兰聊人)和哥特人(Goths)阻隔于匈奴人和罗马帝国之间,所以无论是希腊的或拉丁的作家,对于匈奴人的活动皆无所述及。

只有一次,他们述及亚美尼亚(今俄罗斯高加索中南部)国王泰格兰纳斯(Tigranes,约当公元290年)的军队中,不但有阿兰那佣兵,且还有一对匈奴兵士。半世纪后(约当公元356年),又见到波斯北境遭受Chionites人的攻击。这些Chionites人也许就是一群匈奴人。”^[191]

我国学者岑仲勉引赛克斯(Sykes)《波斯史》卷一:“沙卜尔(Shapur)东方战事自公元350年延至357年,史册殊鲜详载,吾人所知来侵者有Chionites人,即较著于世之Huns人。”^[192]

俄罗斯南乌拉尔奥伦堡(Orenburg)克兹尔-阿德山洞墓中发现的HaⅡ式铜镞,“山”字形耳发展成三个小蘑菇状突起,两耳根的附加装饰上部发展为两个小蘑菇状突起。因此,这件铜镞可能就是西迁匈奴所有。奥伦堡铜镞的发现正好证明了西迁的匈奴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情况。而Hb-1、2两件铜镞的发现则揭示了匈奴同乌拉尔山中段西侧地区的联系。可能这一地区有一部分乌戈尔人(Ugrian)融入到匈人当中,而且匈人铜镞上的穗状装饰可能就来自于这一地区^[193]。这些发现证实了鸠密奈夫(Gumilev)和阿塔莫罗夫6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匈人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匈奴和乌戈尔人的融合体^[194]。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匈人语言中的芬-乌戈尔语因素的存在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匈人和乌戈尔人的联合可能是为了获得乌拉尔山地区人力及金属资源的支持。

这个阶段差不多有190年,实际上是西迁匈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首先是出现人口代际上的变化,如果30年算一代人,那已经发生了六代人的更替。由于和其他民族通婚,本来就比较混血的匈奴民族在种族上变化应当是更大了。其次是文化上的变化,西进过程中,自身文化应当发生变迁,同时吸收很多其他人群的文化不可避免。单从这两个方面看,经过如此巨大的时空转变,匈奴应当已经呈现另一番面貌了。从铜镞看,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时的铜镞形制仍然显示着和中国北方、蒙古地区匈奴铜镞的联系。

第四阶段以HaⅢ式中的第1、2件铜镞为代表,时代约在公元350—374年。也即齐思和先生论证的阿兰时期。

阿兰人分布在今南俄草原以东一带,大抵从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及南至高加索山脉之地,都是阿兰人的领土^[195]。罗马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395年)的《历史》中记载了匈人进攻阿兰人的过程。他记述道:“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阿兰人对匈人予以坚强的抵抗,两军大战于顿河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敌不过勇猛突驰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国被征服,一部分阿兰人逃散各地,但大部分阿兰人都被匈人接受为同盟者。阿兰武士被吸收到匈人的队伍中去,成为匈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北匈奴及其盟族终于到达欧洲的东境^[196]。

这一地区发现的两件铜镞,耳根附加装饰离开主耳,形成蘑菇状突起,是奥伦堡铜镞的发展形式。可以作为匈奴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匈人铜镞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匈人铜镞。这时的铜镞式样还被带回到新疆乌鲁木齐一带,如HaⅢ-13(图四,8),可能为悦般人所使用。国外学者认为此件铜镞是北匈奴从新疆西迁前留下的

遗物,是匈人铜馐的原型^[197]。国内学者也指出了这个发现和西边铜馐的相似性^[198]。但根据其耳部特征,此件铜馐只能是奥伦堡的(Ha II)(图四,2)发展型式。这种耳朵式样只是在库班河、顿河地区才形成,其腹部的纹饰和乌拉尔山西侧的铜馐(Hb-1)十分相近,连大耳下方框间隙中的箭形装饰都一致,而在奥伦堡铜馐还没有这种装饰。因此,此件铜馐应当是公元 350—374 年从库班河、顿河地区传回新疆地区的。这件铜馐可能是在新疆北疆铸造,为铜锡铅合金^[199]。这时期活动于天山以北、热海及特克斯河峡谷的是北匈奴西迁时留下的余部,所以此件铜馐可能为悦般所有。这件铜馐的发现可能说明悦般的势力还曾到达乌鲁木齐一带。

第五阶段以 Ha III、Ha IV、Ha V 和 Hb 铜馐为代表,时代约为公元 374 年到 455 年。公元 374 年匈人出现于欧洲东境,继而征服东哥特国,占领西哥特地区,征服日尔曼部落,攻打东、西罗马帝国,建立“阿提拉帝国”,以至 455 年“匈人帝国”瓦解,这些主要是匈人在欧洲的活动。关于匈人在欧洲的活动,玛恩辰—海洛芬(O. J. Maenchen-Helfen)1973 年的名著《匈人世界》、麦高文的《中亚古国史》有介绍,林幹在《匈奴通史》中有一附录,专述匈人在欧洲的活动^[200]。

欧洲发现的匈人铜馐已被很多学者研究。这些铜馐中的若干件(如 Ha III-10、Ha III-11、Hb-3)和罗马可资断代的器物共存,所以,确定了这一类铜馐的时代。除铜馐材料能说明匈人即匈奴的后裔以及西迁过程外,其它如多色宝石镶嵌风格、卷钵形王冠、叶状垂饰、鞍桥装饰等在欧亚大陆的流行,也说明匈人的西迁^[201]。不过这些因素并不特别说明匈奴的西迁,因为有的因素早就在欧亚草原传播,比如多色宝石镶嵌风格,有的则并不是匈奴发明和特有的器物,有的却能说明西迁的人群中有鲜卑等其他人群的成分。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尽管某些时期的考古材料还嫌稀少,但根据铜馐的研究,欧亚大陆西部匈人的一部分(主要是上层人物)可能是公元 2 世纪中叶从新疆北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其中有可能夹杂一些当时就有或者后来加入的鲜卑血缘的人群。这些人群的后裔一直到达欧洲腹地,建立了阿提拉帝国。至于屡次西迁的原因,在西迁的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时还不能确知,需要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根据匈奴西迁的线索,可以复原比较清楚的匈奴西迁过程路线图(图七)。另外,匈奴在西迁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创新,加上融合了沿途不同的文化,从而使铜馐的形制、纹饰等面目一新。而且,把起源于中国的青铜容器带到了欧洲腹地,到达了青铜馐西传的最远点。匈奴在漫长的西迁过程中,融合了很多民族和文化,形成了一个人种和文化的混合体。这也是学术界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所在。只要学者分析材料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当北匈奴晚期文化比较确定,对匈人人种、语言和文化不同的来源有了确切的了解后,知道了那些是匈奴文化传统,那些是对匈奴文化的继承发展,那些是对沿途其他文化的吸纳、嫁接和融合后,匈人的主体即北匈奴西迁部族后裔的观点将会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也将日趋清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了历史、语言和考古的方法外,还应当发挥体质人类学的优势。利用 DNA 染色体分析匈人父系人种基因的构成和来源,用线粒体分析匈人母系人种构成和来源,



图七 从青铜镡看匈奴的西迁示意图

把这些结果和匈奴王族及一般人群的进行对比研究。这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 青铜(铁)镡在中国北方的最后扩散

北匈奴西迁后,鲜卑民族迅速填充了草原地带的政治空间,随即进入黄河流域,建立封建政权。早期鲜卑民族分布地域和匈奴相接,其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202]。鲜卑文化深受匈奴影响,铜镡即其一例^[203]。内蒙古扎赉诺尔 M14 出土铜镡(Gb I-1)(图二,2)年代为西汉中期,即与匈奴早期铜镡形制相仿(Ga I-1、Gb I-1)。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铜镡(Gc I-9)(图二,6)同诺颜乌拉 M6 匈奴王族墓所出铜镡十分相似(Gc I-3)(图二,4)。另外,Ga 型、Gb 型、Gc 型、Ia 型和 Ib 型为匈奴鲜卑都使用的铜镡。因此,可以认为鲜卑铜镡最初即来源于匈奴铜镡,尔后,又不断学习匈奴铜镡。公元 1 世纪末,匈奴民族衰弱,鲜卑乘势南下,“转移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鲜卑传》)。鲜卑铜镡中也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匈奴余种”使用的铜镡。当然,鲜卑民族也不是全盘接受匈奴的铜镡。鲜卑铜镡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单纯的“山”字形耳铜镡(Gd 型)、环状鏊耳(Gh 型)、三块板形圈足铜镡(J 型)、三突耳铜镡(Gg 型)等就是鲜卑的创新。另外,像大鏊孔的圈足,球形腹体都是鲜卑铜镡的显著特征。值得指出的是,鲜卑铜镡中没有能和蘑菇形耳铜镡有直接发展关系的例子,而且匈奴人的铜镡圈足没有鏊孔,因此阿尔泰山以西的铜镡并不是从鲜卑铜镡发展出来。这说明匈奴的主体并不是鲜卑,只可能是在新疆北疆活动的北匈奴的后裔。

鲜卑原为东胡的一部分,燕昭王时“秦开破东胡”,此后“冒顿单于攻破东胡”(《史记·匈奴

列传》)。东胡被迫退避东北,到西汉末又开始南迁。2 世纪中叶,建立了檀石槐部落大联盟。东汉末年,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后,鲜卑分裂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部分。拓跋鲜卑南迁,后居中原,统一北方。东部鲜卑则居辽西,右北平塞外紫蒙川(今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一带),后入辽西,并建立政权。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西燕、吐谷浑和代(北魏)。指明鲜卑铜镡的国属及所反映的民族迁徙问题是鲜卑铜镡研究的重要方面。

尚晓波认为筒腹双耳镂空圈足镡属于东部鲜卑,鼓腹双耳镂空圈足镡属于拓跋鲜卑,并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204]。然而,筒腹和鼓腹并不是区别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的特征。拓跋鲜卑铜镡早期也是筒腹的,如内蒙古土默特旗砖石墓出土铜镡(Ga II-1)(图一,3),鼓腹应是晚期的特征。铜镡底部的圆柱这一特征似乎可视为东部鲜卑的特点,如喀左县草场乡于杖子铁镡(Ga III-4)(图一,8)、朝阳七道泉子乡下河首果园铁镡(Ga III-5)(图一,9)的底部都有一圆柱。因此甘肃秦安五营邵店出土铜镡(Ga II-8)(图一,5)可能是慕容鲜卑使用的。慕容鲜卑曾活动于整个中国北方,建立了若干封建国家,但在黄河流域发现属于慕容鲜卑的铜镡还很少,这可能和慕容鲜卑入主中原建立封建国家有关,或许是还未发现。90 年代,考古学者发掘了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属于三燕文化的有 355 座,其中有的墓出土了青铜(铁)镡。从这些发现看,青铜(铁)镡并不是普遍的随葬品,只在个别墓中出现,这可能和墓主的身份和背景有关系^[205]。

J 型三块板状圈足的铜镡,极有可能是拓跋鲜卑的,因为内蒙古西林县苏泗汰墓葬出土的 J 型铜镡和拓跋鲜卑典型的陶罐和三鹿纹金饰牌共存(J-1)(图三,1),而且 J 型铜镡也不见于大凌河地区。青海民和县塘尔源营盘出土铜镡(Ge-1)(图三,14),似为慕容鲜卑(吐谷浑)的遗物。罐型铜镡(Ia I)早期的耳朵为方耳,而且耳根有阶梯形装饰。这种铜镡为匈奴(Ia I-1)和鲜卑(Ia I-2)(图三,9)共有。尔后,罐型铜镡的耳朵发展为直立环耳(Ia II),时代从东汉晚期到南北朝都有,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是可确定年代最晚的例子,年代在公元 415 年左右(Ia II-12-14)。这种铜镡不但在北方流行,而且南方也发现不少,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如河南巩县芝田公社出土一件,时代可能为东汉至魏晋(Ia II-8)。湖北鄂城钢铁厂古井发现一件,时代为公元 222 年左右(Ia II-10)(图三,8)。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竖穴砖棺墓出土一件,时代为 3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Ia II-9)。四川双流黄水乡岩洞墓出土一件,时代为南北朝(Ia II-11)。这类铜镡的式样可能是内迁匈奴带入或者是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桶形铜镡(Ib 型)为匈奴和鲜卑共有,最早出现于东汉初期,时代下限不清,可能在孝文帝改革之时。Ib III 式铜镡在吉林、内蒙古、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都有发现,而且传到朝鲜半岛,吉林省集安太王乡(Ib III-15)、浑江县(Ib III-16)、韩国金海大成洞 29 号、47 号墓(Ib III-18、19)和伽耶文化(Ib III-20)均出此式铜镡。集安铜镡属高句丽,金海和伽耶铜镡属弁韩发展形成的伽耶诸国。4 世纪时朝鲜半岛同鲜卑民族有着密切交往^[206]。高句丽和伽耶铜镡的发现正反映了这一历史。

Gg 型铜镡形制非常特殊,为环形附耳,耳上有三个非常发达的突起,球形腹,有不明显的圈足。这种耳部起三突的铜镡是塔加尔文化、斯基泰文化、萨尔马泰文化铜镡的特点。从时间角度考

虑,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墓发现的这件铜镡可能与萨尔马泰文化铜镡有关系,不过,其间环节还需今后的考古工作。1935年,在南西伯利亚的Bol“sogo Tesinskogo”封堆墓中发现了一件耳部装饰三个乳突的陶镡。在图瓦的阔凯,五六十年代发掘了一批墓葬,与少量的小型镡一起,出土了大量的陶镡,尺寸在15—25厘米之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直立环耳,无装饰;一种是直立环耳,有三个乳突;一种是直立方耳,有三个乳突。绝大多数陶镡和铜镡一起出于男性墓,这些墓的时代被定到公元1世纪,这些陶镡都是青铜镡的仿制品^[207]。这为本文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1989年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沙尔布拉克发现一件,现藏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通高37.2、口径27—28、底径13.5厘米,颈部有附耳,圈足低矮,有三角形镂孔(Ga I-2)(图一,2)^[208]。可能属于公元487年阿伏至罗和穷奇建立的高车国所有^[209]。但从其圈足镂孔和尖圈底腹看,时代可能要早一些。

1901年2月10日,斯文·赫定的探险队在罗布泊北部的库鲁克山地区发现一件铁镡,40—45厘米高,球腹,肩部有一圈细小网格纹,腹中部有两个活动小环耳,底部有一个大镂孔圈足(Gf-1)(图三,5)。这件铁镡的腹体以及大镂孔圈足和鲜卑的Ga VI和Gd II式铜镡很相近,可能仿自鲜卑铜镡。《南齐书·芮芮传》提到,在南朝齐永明年间(约为永明九年至十一年间,即公元491—493年间),益州刺史刘俊派江景玄出使丁零,“宣国威德”(丁零,一般认为是指崛起不久的北方部族高车)。江景玄在出使途中,曾路经鄯善,据他亲临其地证实,那时的鄯善已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因此,这件铁镡可能是丁零人的遗物^[210]。

鲜卑铜镡源远流长。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的银提梁小壶还保持着鲜卑铜镡圈足镂孔、鼓腹的作风。根据墓志,李贤乃为鲜卑拓跋氏的后裔^[211]。因此,李贤墓中出土镡形的容器也就不足为怪了。1988年发掘的北周王德衡墓也出了一件类似器物^[212]。

匈奴兴起很早,但在早期的匈奴墓中却不见铜镡,即使到匈奴鼎盛时期,现能确认为匈奴的铜镡也很少,相反到匈奴西迁后,发现的匈奴铜镡多了一些。而鲜卑却不同,随着鲜卑民族的强大和迁徙,铜镡继东周之后,再次在中国北方繁盛起来,而且发展出很多新的型式,并且影响到周边游牧民族,如丁零族、高句丽等。可称为青铜(铁)镡在中国北方的最后扩散。其在中国终结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有关。因为,镡是北方游牧文化的产物,是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取向紧紧相适应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镡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萨满仪式中使用的一种祭器,一旦鲜卑民族接受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佛教,特别是鲜卑信奉佛教,就彻底使镡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因为有经典仪轨的佛教有自身特殊的一套法器,萨满教使用的铜镡自然派不上用场。随着拓跋鲜卑入居农耕区,采取计口授田、分土定居、宗主督护制^[213]和信奉佛教的政策,拓跋鲜卑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越来越多,铜镡在北魏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到北魏完全信奉并大力推广佛教,施行汉化政策之后,中原地区就渐渐不见铜(铁)镡的踪迹了。197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理了一座北魏墓,时代相当于拓跋珪定都平城前后^[214]。学者认为此墓主为拓跋鲜卑族^[215]。此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中原非常相近,出了一套与庖厨有关的生

活用具明器,如陶灶,但无铜镬的发现。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铸有汉文的铜镬,体现了汉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影响,也预示着铜镬在中国北方的终结(Ga III -10)(图一,6)。1973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雷祖庙清理了一座完整的漆棺墓^[216]。此墓时代为太和八年(484 年)至太和十年(486 年)^[217],正是献文帝已死、冯太后开始推行汉化政策期间。通过对漆棺画的分析,墓主“属于反汉化的那股势力”,追慕象嘍哒那样“骑马民族”国家的生活^[218]。尽管如此,此墓却无铜镬的发现。当然,铜镬的消失虽然很快,但也不是非常快,可能有一个短暂的过渡。太原北齐娄睿墓墓道西壁壁画上所画铜镬和库狄业墓出土的小型铜镬(Gf-6)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晚样本,这可能同北齐的胡化政策有关。在中原,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铜镬就从北魏社会生活中渐渐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其线索就渐渐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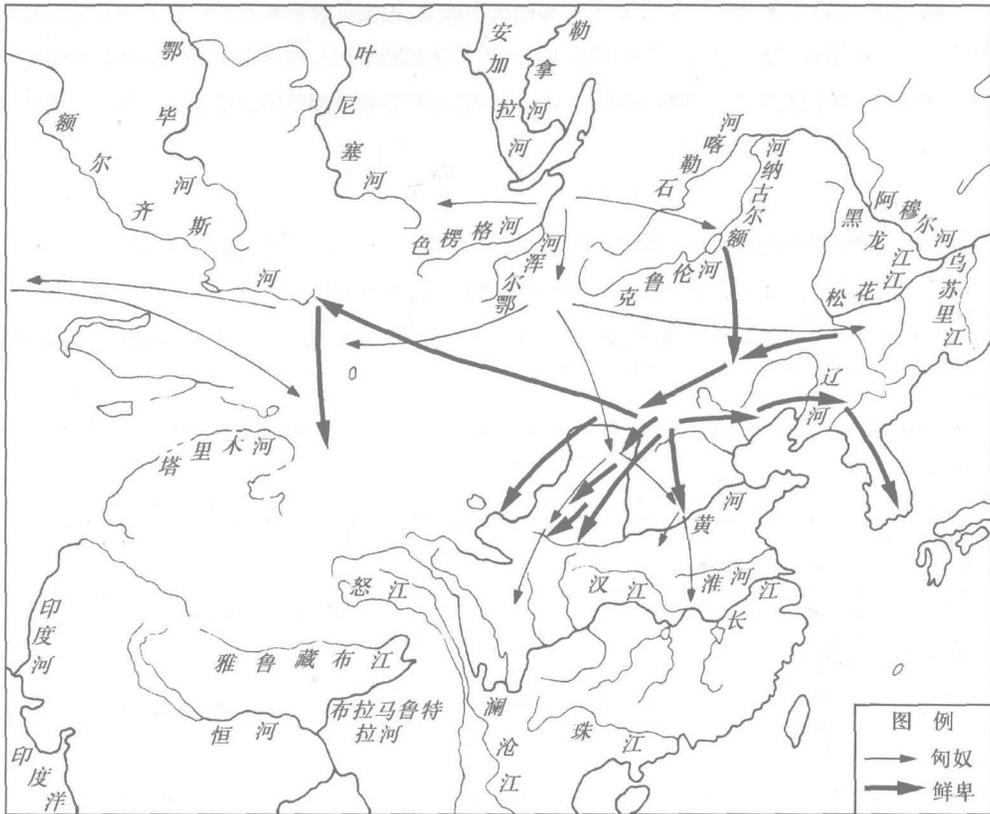
(三) 镬的余绪

在鲜卑民族融入汉民族之后,发展了近二千年的镬就渐趋衰落了。6 世纪后,在中国就几乎不见镬的踪影了。但在更北的地区,使用镬的传统保持到公元 8 世纪。俄罗斯图瓦地区的艾梅尔雷格 3 号古墓群 5 号墓组 1 号墓中发现了一件双耳大镂孔圈足的铁镬,其形制显然来源于鲜卑铜镬。这件镬同唐代的铜镜以及开元通宝同出一墓,其年代大致在公元 8 世纪中叶,这时期是回纥统治图瓦时期。因此,这件铁镬可能是回纥民族使用的遗物(Ga V -1)(图一,12)^[219]。不过,图瓦地区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因此,对这件铁镬是何种人使用的问题,还不能确定。另外,在回纥兴起之前,北方还有突厥和柔然,因此,图瓦铁镬不会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似乎暗示着,柔然和突厥也可能少量使用镬,否则,图瓦铁镬的来源就不好解释了。当然,这只是个假设,镬在北方具体的传承细节,还有待日后的考古发现。

图瓦铁镬是迄今发现的最晚一件标本。8 世纪晚期以后,镬就销声匿迹了。个中缘由,值得深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从公元 6 世纪中期起,蒙古高原兴起了以突厥系为中心的游牧民族,草原地带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游牧民族开始使用独自的文字,大规模的都市得到建设,信仰真正意义上拥有经典的宗教,萨满信仰衰落。民族间的交易大大超过前代,石人、马镫和打火石广为流传^[220]。特别是宗教信仰的改变,游牧民族有了表达信仰和艺术旨趣的新形式,与草原萨满教相依相生的镬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信仰基础。实际上铜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消失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草原民族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包括动物风格艺术的衰落也与此有关^[221]。另外,可能与铁器在北方民族中大量使用有关,因为铁不太适合铸造像镬这样复杂的容器,铁的廉价也不符合祭祀用具的特点。因此,唐代以后的北方民族中,带圈足的镬就不见了,而出现了器形简单的圈底大锅,仅仅是一种大型炊器,如内蒙古博物馆藏的元代大铁釜。

五 结 语

青铜(铁)镬是北方民族在日常生活和祭祀仪式中使用的一种大型金属容器。其起源时间



图八 第二群青铜(铁)镞的传播示意图

早,流行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型式多样,反映了北方民族精神世界的变迁以及活动的历史。通过研究这种容器,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欧亚大陆北方民族的文化以及同农耕社会的关系,探讨民族迁徙的问题。

在继承中国战国晚期北方游牧民族铜镞式样的基础上,第二群铜镞随匈奴的活动在贝加尔湖地区及中国北方发展起来(图八),并随北匈奴的西迁,经新疆北疆、里海黑海北岸,传到了欧洲腹地。在这个长期西进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征明显的匈人式铜镞,到达了铜镞西传的最远点(图七)。鲜卑人受匈奴影响,也使用铜镞,而且发展出很多样式,并随鲜卑的活动,在整个中国北方兴盛起来,进而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新疆地区(图八)。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之后,铜镞渐渐消失。北齐时期可能有一个微弱的复兴,之后铜镞在中国彻底衰落。但镞这种特殊的容器在中国之外的北方草原地区一直发展到公元8世纪。

对北方民族的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铜(铁)镞是欧亚草原民族重要的文化构成,其研究正反映了“世界性”。虽然铜镞起源于中国,但它却在整个欧亚大陆流行。因此,今天对铜(铁)镞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乃是一百多年各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考古工作新的发现和发展,对铜(铁)镞的研究也将是永无止境的,对铜(铁)镞的认识也将不断充实和完善。

附记: 本文是作者 1999 年硕士毕业论文的后半部分。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得到业师林梅村教授的悉心指导。材料收集和写作过程中, 中外诸多师友也曾给予热心帮助。调查期间, 得到新疆、内蒙古、宁夏、陕西各文博单位诸位先生女士的热情帮助。考古所刘方、韩慧君老师帮助绘制文中插图。谨致衷心感谢!

注 释

- [1] 郭物:《论青铜镎的起源》,《21 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 [2] 郭物:《青铜镎在欧亚大陆的初传》,《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 年。
- [3] Flóris Rómer, A czokói bronz-edény (The bronze vessel from Czakó), *Archaeológiai Értesítő* II (14. SZ), 1870.
- [4] P. Reinecke, Die Scythischen Alterthümer im mittlern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28, Berlin, 1896.
- [5] J. Hampel, Skythische Denkmaler aus Ungarn. *Ethn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Ungarn*, 4, 1, Budapest, 1895.
- [6] Bela Pösta, *Archaeologische Studien auf russischem Boden*. (Hungarian-German bilingual) Budapest: Hornyánszky Verlag, 1905.
- [7] Felvinczi Takács Zoltán, Chinesisch-Hunnische Kunstformen, Bulletin de l'Inst. *Archeologique Bulgare*, 1925.
- [8] A. Alföldi, Leletek a hun korszakból és ethnikai szétválasztásuk. Funde aus der Hunnenzeit und ihre ethnische Sonderung. *Archaeologia Hungarica*, Budapest, 1932, Vol. 9, p. 34, fig. 5.
- [9] Werner, Joachim. Beiträge zur Archäologie des Attila-Reiches I — II. München: Abhandl.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56.
- [10] László Gyula, Études archeolog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des Avars. *Archaeologia Hungarica* 34, 1955. *A népvándorlások művészete Magyarországon* (Art of the age of migration in Hungary), Budapest: Corvina kiadó, 1970.
- [11] I. Kovrig, Hunnische Kessel aus Umgebung von Várpalota. *Folia Archaeologica*, 23, Budapest, 1972.
- [12] 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 [13] N. A. Bokovenko, and P. Irina Zaseskaia, Proishozhdenie kotlov "gynnnskogo tipa" Vostočnoj Evropi v svete problemy hunno-gunnskih svjazej. *Peterburgskij Arheologičeskij Vestnik*. S. - Peterbury: FARN, (3). 1993.
- [14] P. Irina Zaseckaja & A. Nikolaj Bokovenko, The Origin of Hunnish Cauldrons in East-Europ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1994.
- [15] Miklós Érdy, Unique Xiong-nu Cauldron from Urumqi. *Inner Asia Report*, Newsletter-Harvard (Cambridge, USA), (No. 7) Fall, 1990.
- [16] Miklós Érdy, The Xiong-nu Type Cauldrons Throughout Central Eurasia and Their Occurrence on

- Petroglyphs.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MS distributed 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rch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Ancient Nations.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August 11—18, 1992, Ibid. MS is included in the republication of facsimile MSS. Vol. I—III.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600 kalmia Ave, Boulder, Co 80304, USA.
- [17] Miklós Érdy, An Overview of the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of Eurasia in Three Media With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work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 [18] Miklós Érdy, 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Eurasian Students Yearbook*, Continuation of Fortsetzung der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Ural-Altaiic Yearbook 67, Berlin, Bloomington, London, Paris, Toronto, 1995.
- [19] Emma C. Bunker, with S. Trudy, Kawami, Katheryn M. Linduff, Wu En.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distributed by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1997, pp. 178, 239, 240, 269.
- [20] F. SO. Jenny and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attle and London, 1995.
- [21] 梅原末治:《北支那發見の一種の銅容器と其の性質》,《東方學報》第一冊,1931年。
- [22]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內蒙古・長城地帶》,173—191頁,圖版二三、三四,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一冊,東亞考古學會,1935年。
- [23] 高浜秀:《中国的鍳》,《草原考古通信》1994年4号。
- [24] 高浜秀:《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国北方の青銅器》,東京国立博物館,1997年。
- [25] 藤川繁彦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学》,日本世界考古学系列丛书第6卷,同成社,1999年。
- [26] 李逸友:《內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通讯》1956年2期;《关于內蒙古土默特旗出土文物情况的补正》,《考古通讯》1957年1期。
- [27]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 [28] 顾志界:《鄂尔多斯铜(铁)釜的形态分析》,《北方文物》1986年3期。
- [29] 张玉忠、赵德荣:《伊犁河谷发现的大型铜器及有关问题》,《新疆文物》1991年2期。
- [30] 李肖、党彤:《新疆准噶爾盆地周緣地區出土銅器初探》,《內陆アジア史研究》1992年7、8合期。
- [31] 冯恩学:《中国境内的北方系东区青铜釜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 [32] 卜扬武、程玺:《內蒙古地区铜(铁)鍳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1、2期。
- [33] 王博、祁小山:《新疆出土青铜鍳及其族属分析——兼谈亚欧草原青铜鍳》,《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 [34] 尚晓波:《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空圈足釜及相关问题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1期。
- [35] 同[18], Table 5—2。
- [36] 同[33], 290、292页, 图十一, 8。
- [37] 李逸友:《內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通讯》1956年2期, 60页, 图版拾伍, 1。
- [38]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2期, 86页, 图二。

- [39]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 年 6 期,图七,1。
- [40] 同[18],Table6-2-24。
- [41] 王长启:《西安市文管会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及其特征》,《考古与文物》1991 年 4 期,7 页,图一,3。
- [42] 同[22],图 105,1。
- [43] 秦安县文化馆:《秦安县历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物》1986 年 6 期,41 页,图三。
- [44] 同[24],186 页,图版 232。
- [45] 国家文物局:《1998 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4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 1998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 年 2 期,225 页,图一七,1。
- [47] 同[46],227 页,图一九,2。
- [48] 卢桂兰:《榆林地区收藏的部分匈奴文物》,《文博》1988 年 6 期,16 页,图版肆,1。
- [49] 同[22],图版二四。
- [50] 同[18],Table6-2-6。
- [51] 尚晓波:《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空圈足釜及相关问题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 年 1 期,27 页,图二,3。
- [52] 同[51],27 页,图二,4。
- [53]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 3 期,5 页,图版贰,2。
- [54] 同[18],Table6-2-25。
- [55]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 年 7 期,42 页,图四。
- [5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 1998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 年 2 期,227 页,图一九,1,图版贰拾柒,1。
- [57] 同[22],1935 年,图 105,2。
- [58] 同[18],Table6-4-1。
- [59] 同[18],Table6-2-7。
- [60] 同[18],Table6-2-4。
- [61] 同[18],Table6-2-5。
- [62] 奥甫琴尼科娃:《中亚图瓦的古代突厥武士墓》,《苏联考古学》1982 年 3 期。
- [63] 同[18],Table5-5。
- [64] 同[18],Table5-4。
- [65] 李逸友、魏坚:《扎赉诺尔古墓群 1986 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372、376 页,图九,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 [66]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 年 9 期,16-18 页,图 3。
- [67] 同[22],图 105,3。
- [68] 同[22],图版二六。
- [69] 同[18],Table6-2-15。
- [70] 同[51],27 页,图二,5。

- [71] 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205—207页,图三,1,彩版贰伍,1,科学出版社,2004年。
- [72] 同[18],Table5—13。
- [73] 同[18],Table6—2—27。
- [74] 同[18],Table5—14。
- [75] 王刚:《赤峰发现鄂尔多斯式铜镞》,《北方文物》1996年2期,15页,图二。
- [76] 同[18],Table6—2—40。
- [77] 同[18],Table6—2—28。
- [78] 同[18],Table6—2—26。
- [79] 卜扬武、程玺:《内蒙古地区铜(铁)镞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1、2期,14页,图一,10。
- [8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48—49页,图四二,1,文物出版社,1987年。
- [81] 同[18],Table5—12。
- [82] 同[24],图版229。
- [83] 同[24],图版230。
- [84] 同[18],Table5—3。
- [85] 卢桂兰:《榆林地区收藏的部分匈奴文物》,《文博》1988年6期,图二。
- [86] 同[32],15页,图一,3。
- [87] 同[22],图106。
- [88] 同[18],Table6—3—2。
- [89] 同[18],Table6—2—16。
- [90] 同[18],Table5—15。
- [91] 同[22],图版三四。
- [92] 同[27],147页。
- [93] 同[19]。
- [94] 同[27],397页,图三,3。
- [95] 同[22],图112,3。
- [96] 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译:《罗布泊探秘》,125—126、128页,图3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 [97] 同[22],图112,4。
- [98] 同[22],图版二六,3。
- [99]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3期,32—34页,图二三,图二四,4。
- [100] 内蒙古博物馆藏。
- [101] 同[18],Table6—3—3。
- [102] 同[46],225页,图一七,2,图版拾陆,1。
- [103] 同[18],Table3—4。
- [104] 同[18],Table2—8。

- [105] 同[18], Table1—19。
- [106] 同[12], p. 316, fig. 47。
- [107] 同[106], p. 307, fig. 32。
- [108] 同[12], p. 313, fig. 39。
- [109] 同[12], p. 314, fig. 41。
- [110] 同[18], Table1—14。
- [111] 同[12], p. 312, fig. 38。
- [112] 同[12], p. 310, fig. 35。
- [113] 同[12], p. 311, fig. 37。
- [114] 同[18], Table1—6。
- [115] 同[18], Table1—13。
- [116] 同[12], p. 313, fig. 40。
- [117] 王博:《新疆近十年发现的一些铜器》,《新疆文物》1987 年 1 期, 46—47 页。
- [118] 同[12], p. 318, fig. 49。
- [119] 同[18]。
- [120] 同[12], p. 315, fig. 43。
- [121] 同[12], pp. 318, 322, fig. 50。
- [122] 同[12], p. 309, fig. 34。
- [123] 同[12], p. 311, fig. 36。
- [124] 同[12], p. 317, fig. 45。
- [125] 同[12], p. 316, fig. 46。
- [126] 同[12], p. 308, fig. 33。
- [127] 同[32], 15 页, 图一, 12。
- [128]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1964 年, 5 页。
- [129]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 年 4 期, 图十七, 5。
- [130] 巩县文化馆:《河南巩县发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74 年 2 期, 124 页。
- [131] 张静安:《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六朝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 年 7 期, 54—55 页。
- [132] 鄂钢基建指挥部文物小组等:《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 年 5 期, 358 页, 图一, 1。
- [13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 8 期, 428 页, 图七。
- [134]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 3 期, 5 页, 图三一。
- [135] 同[22], 图版三二。
- [136] 同[45], 75 页。
- [137] 同[46], 227 页, 图一九, 4。
- [138] 同[27], 397 页, 图三, 4。
- [139]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1964 年, 5 页。
- [140] 同[27], 397 页, 图三, 2。

- [141] 同[27],146页,图105,2。
- [142] 郭治中、魏坚:《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434页,图二,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43] 同[22],图版二七。
- [144] 同[22],图版三三。
- [14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48—49页,图四二,2,文物出版社,1987年。
- [146] 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期,26页,图七。
- [147] 王克林等:《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4期,图十五,3,图版叁,1。
- [148] 同[147],图十五,2。
- [149] 同[147],图十五,1,图版叁,2。
- [150] 雷云贵、高士英:《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40页,图一,1,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51] 同[18],Table5—9。
- [152]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图一五四,13,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53]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浑江县文物志》,68页,1987年。
- [154]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8—16页。
- [155] 转引自高浜秀:《中国の鍏》,《草原考古通信》1994年4号,8页。
- [156] 申敬澈:《四、五世纪代の金官伽の实像》,《巨大古坟と伽耶文化》,角川书店,1992年;金龙:《考古学より見た伽耶》,《伽耶文化展》,朝日新闻社,1992年。
- [157] 同[22],图版二八。
- [158] 同[22],图112,6。
- [159] 同[22],图112,5。
- [160] 林西县文物管理所:《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461页,图二,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161] 王刚:《赤峰发现鄂尔多斯式铜镞》,《北方文物》1996年2期,15页,图一。
- [162]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器》,《考古》1983年1期,72页。
- [163] 耿青岩:《河南淇县出土一件北魏铜双耳釜》,《考古》1984年3期,277页,图一。
- [164] 同[22],图113,4,图版二五。
- [165] 卢桂兰:《榆林地区收藏的部分匈奴文物》,《文博》1988年6期,17页,图版肆,4。
- [166] 李逸友:《札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 [167] S. G. Botalov, the Xiong-nu and the Hu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1 (13), 2003, pp. 106—127.
- [168]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PHE, Paris), Huns et Xiongn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9(1), 2005.
- [169] 章炳麟:《匈奴始迁欧洲考》,《章太炎文集》(四),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7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 [171] 金元宪:《北匈奴西迁考》,《国学论衡》第 5 期(上),1935 年。
- [172] 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中外文化》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 [173]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 年 3 期。
- [174] 肖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历史研究》1978 年 7 期。
- [175] 林幹:《北匈奴西迁考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 年 1 期。
- [176] 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民族史论丛》第 1 辑,中华书局,1987 年。
- [177] 王彦辉:《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考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 3 期。
- [178] 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179] 内田吟风:《フン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匈奴史研究》,1953 年。
- [180]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论质疑》,《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 [181] 余太山:《关于 Huns 族源的臆测》,《文史》第 34 辑,中华书局,1992 年。
- [182] 邱克、王建中:《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西北民族文丛》1983 年第 2 辑。
- [183] 最近,贾依肯对中外学者就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的历史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贾依肯:《匈奴西迁问题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 年 9、10 期。
- [184] 冯恩学:《中国境内的北方系东区青铜釜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
- [185] 林沅:《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 [186] 乌恩岳斯图:《论石板墓文化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187] S. S. Miniaev, On the Origin of the Hsiung-n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 Chinese Ancient Nations, Hohhot, Inner Mongolia, August, 1992.
- [188] 余大钧:《公元 91 年后居留新疆北部一带的北匈奴》,《中华文史论丛》第 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 [189] 舒顺林:《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内蒙古师大学报》1986 年 3 期。
- [190] 吴兴勇:《论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 年 3 期。
- [191] 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 年。
- [192]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44 年。
- [193] 同[14]。
- [194] L. N. Gumilev, *Hunnu. Central' naja Azija v Drevnie Veka*, Moskva, 1960. Artamonov, M. I. *Istorija Hazar*, Leningrad, 1962.
- [195] 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 年。
- [196]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Penguin, 1986, pp. 410—443.
- [197] 同[15]。
- [198] 张玉忠、赵德荣:《伊犁河谷发现的大型铜器及有关问题》,《新疆文物》1991 年 2 期。
- [199] 梅建军:《新疆出土铜镜的初步科学分析》,《考古》2005 年 4 期。
- [200]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201] 同[25]。
- [202] 乌恩：《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03]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5期。
- [204] 尚晓波：《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空圈足釜及相关问题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1期。
- [20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2期。
- [206] 王巍：《从考古发现看四世纪的东亚》，《考古学报》1996年3期。
- [207] S. Vainstein, Kokel Cemetery and Problem of History of the Hunnu in Central Asia,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rchaeology,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Ancient Nations*, Vol 2 (WU) of preprints of papers,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Aug. pp. 11—18, 1992.
- [208] 王林山、王博：《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23页，图版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
- [209]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 [210] 同[209]，186—190页。
- [211]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12页，图二十七，1。
- [212] 袁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50页，图九九，图版一二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 [21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 [214] 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5期。
- [215]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11期。
- [216]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6期。
- [217] 罗丰：《固原北魏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18] 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 [219] 冯恩学：《中国境内的北方系东区青铜釜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 [220] 同[25]。
- [221] Dagny Carter, *The Symbol of the Beast-The Animal-Style Art of Eurasia*,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57, pp. 92, 171.

A STUDY OF THE SECOND GROUP OF BRONZE/IRON *FU* CAULDRONS

by

Guo Wu

The bronze/iron *fu* cauldron is a large-sized cooking vessel North China nomads invented in the early 1st millennium B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ng-Zhou bronze

culture. It was used also as a sacrificial vessel in shaman ceremoni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it plays the role of a piece of material evidence on ancient western-ea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igrations of northern steppe tribes.

The unearthed bronze/iron *fu* can be assigned to two major chronological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 second, later phase group. An analysis is made to investigate the pedigree of the collected specimens by using the archaeological typological method. In the light of the features of the vessel base, this group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i. e. Type G with a perforated ring-foot, Type H with a perforation-less ring-foot, Type I without ring-foot, and Type J with three broad legs, each of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types. In periodization, these *fu* underwent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1) In the 2nd to 1st centuries BC, bronze/iron *fu* evolved mainly in the East Asian steppes. (2) From AD 1st to late 5th century, two groups of *fu* develop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ype H towards Europe, reflecting the migration of Xiongnu Tribes; and Type G, I and J in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mirroring activities of the Xianbei Trib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vessels among other ethnic groups. (3) In AD 5th to 8th centuries, bronze/iron *fu* were used principally in Tuva and other steppes in high latitud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part (mainly upper social strata) of the Huns in western Eurasia must have been the posterity of Xiongnu tribesmen migrating westwards from northern Xinjiang in the middle of AD 2nd century, who developed perforation-less ring-foot bronze *fu* with bridge-like loops in the shape of large mushroom through innovation and amalgamation, and brought this type of bronze vessel into the hinterland of Europe.

The Xianbei Tribes' use of bronze/iron *fu* resulted mainly from Xiongnu's influence. Their creations include the “山”-shaped simple handle, the loop-shaped broad handle, the ring-foot consisting of three broad legs, and the triple vertical handle. Their *fu* feature distinctly the ring-foot with large perforations and the global belly. The disappearance of bronze/iron *fu* might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Xianbei's being converted to Buddhism and Emperor Xiaowendi's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sinicization. Following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Xianbei Tribes into the Han Nationality, the *fu* gradually fell down after its evolution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Since the 6th century, this kind of vessel has almost completely gone off from China. But in more northern areas, the tradition of using *fu* was maintained down to the 8th century.

责任编辑：谭长生